

以政治共同体为基本分析单元的理论

潘维

【摘要】

“国家”（state 政权）与社会两分的知识框架已不复有助于创造新知，并导致国内与国际知识的逻辑断裂。以城邦为历史起点，“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entity）是在一定地缘内、有统一政权领导、成员一起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的“搭帮过日子”群体。五千年来，政治共同体间的生存竞争及由竞争而来的相互交流和彼此促进，推动了一切实用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一切社会和社会观念的变迁，一切语言和宗教文化的演化、一切政治设施和法律体系的进化，从而塑造人类社会演化史的主线索，并可由这主线索予以解释。社会演化史的主线索是：原始部落聚合为城邦、大小城邦聚合为领地、封建领地聚合为国家、中小国家聚合为大国甚至超大型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分合进退和兴衰续绝取决于其竞争力，即相对的规模、内聚力、生产力，以及这三要素间的张力与合力。

【关键词】政治学、政治共同体、政权、社会、历史哲学

春秋战国时代的先贤给今人留下两句至理名言。《孟子》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为什么国之存亡系于“法家拂士”和“敌国外患”？《左传》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为什么“祀”和“戎”是国家最重要的两件大事？

先贤留下上述“至理名言”，却未留下因果逻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就未被视为确定的知识。重大国事很多，关于国事的“至理名言”也很多。视需要择用不同的至理名言为证，是古老习惯。而今民智大开，要求讲道理。“讲道理”就是抽象出因果关系，就是理论。

已有的中西政治理论聚焦国民与政权的关系，以社会（society）与政权（state）两分解释历史演化。中国理论强调政权塑造社会构成，政权的先进性决定社会先进性。西方理论强调社会构成塑造政权，社会的先进性决定政权先进性。

细致、更细致地拆分社会和分类政权是当前获取新知识的主要方法。然而，政权与社会两分的方法已经不再能带来新知，更导致了“国际”与“国内”知识体系的逻辑断裂。

老子断言：“三生三，三生万物”。作者试图找到“政权（state）与社会（society）”两分之外的“三”。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entities）间的生存竞争，是本文认定的“三”。

本文试图建构“以政治共同体为基本分析单元”的知识体系，统一解释“国内”和“国际”政治。作者期待这“国家理论”比现有的“政权

(state) 理论”能更有效地解释“国家”进化，也为先贤的前述至理名言附加个因果解释系统。本文结论如下：

“政权与社会”两分的知识框架不再有助于创造新知，并导致国内与国际知识的逻辑断裂。以城邦为历史起点，“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entity）是在一定地缘内、有统一政权领导、成员一起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的“搭帮过日子”群体。五千年来，政治共同体间的生存竞争及由竞争而来的相互交流和彼此促进，推动了一切实用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一切社会和社会观念的变迁，一切语言和宗教文化的演化、一切政治设施和法律体系的进化，从而塑造出人类社会演化史的主线索，并可由这主线索予以解释。社会演化史的主线索是：原始部落聚合为城邦、大小城邦聚合为领地、封建领地聚合为国家、中小国家聚合为大国甚至超大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分合进退和兴衰续绝取决于其竞争力，即相对的规模、内聚力、生产力，以及这三要素间的张力与合力。

上述思想重构人类五千年社会的演化史，指出社会演化的另类路径，构筑新的“史观”，即历史哲学。

本文分为五节。第一节说明引入政治共同体概念的原因；第二节指出拆分政治共同体的学理困境；第三节分析现有西学理论的缺陷；第四节概述“以政治共同体为基本分析单元”的理论；第五节概述“新史观”的学理位置和应用价值。

一、引入“政治共同体”概念

本节有两个目的：一是从中国视角说明中西“国家”概念的流变；二是指出政治学需要引入“政治共同体”概念的两大原因。

1、中西“国家”概念的误读

什么是“政治共同体”？中文“国家”的本意就是“政治共同体”，即国民、国土、政权的三位一体。“国家”包含政权，却远不仅是政权。很遗憾，当代中文普遍以“国家”指称“政权”（state），而以“社会”指称“家”。这迫使笔者以“政治共同体”取代“国家”。

自古以来，“中国”是“家国同构”的政治共同体，故称“国家”。“国”类似“大家庭”，包含无数小家。由小家而大家，由大家而国家，是国土、政权、国民及其福祉的三位一体。

古文“中国”原指“都城”。城邦政权统领本邦民众及四方乡土。三千年前，西周聚合数百成千城邦，实现了“封建”大一统，是中华政

治共同体“大一统”的开端。

孔子精编西周诗歌，即《诗经》。其中，《大雅·民劳》传为西周时的“召穆公”召虎所作。召虎，姬姓召氏名虎。公元前841年，周厉王被都城镐京的“国人暴动”推翻，召虎与周定公辅佐周宣王即位，即“周召共和”，是为中国史确切纪年的开端。《民劳》里有“民亦劳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之句；同句里连用“民、小康、中国、四方”四大概念，显然包含民和民之福祉、居于都城的政权、以及国民和政权赖以生存的四方国土。还有，“民亦劳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逖”；“民亦劳止，汙可小愒；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民亦劳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这几句以民生为政治之本的古朴诗句，惊天地、泣鬼神，感动中华三千年。国泰民安、国无有残，迄今仍是中华百姓的至诚愿望。据左丘明的《国语》，至理名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也出自召虎。

西人称国民、国土、政权三位一体的“国家”为“nation”。这个概念的原初含义是“国民”，与《民劳》里的“民”类似。但较之三千年中华大一统，“nation”在西方出现得很晚，晚到17世纪中叶。

中世纪欧洲充斥封建王公“领地”（kingdom）。民众附属于王公贵族拥有的“四方”乡村土地（country）。这些土地和地上属民常被王公当嫁妆相互赠送。西方学界公认：欧洲的“nation”是1648年打完“宗教战争”（三十年战争）后才出现的，迄今不到四百年。战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国界固定，即王公不能再随意互赠国土和国土上的民众。随之而来的是“人民主权”概念。“主权”原指“天主”的治权；“人民主权”则以“国民”（nation）取代“天主”。

因欧洲直到“近代”才结束“封建”史，西文有政权（state）、国土（country）、国民（nation）三者的分称，但缺少政治共同体的统称。中文以“国家”为政治共同体的统称，但缺少三者的分称。于是，西文三个分称在中文里都被译为“国家”。这是当代中文用“国家”指称“政权”（state）的最初缘由。

类似中国古典的“民本”思想，西文“nation”的原意是“国民”，而今则代指传统中文意义上的“国家”，即国土、国民、政权三位一体的政治共同体。

何为“三位一体”？国民生活在国土上，以国界区分。国土是“人民主权”的硬界限。厘定了国土界限，才谈得上“民主”。

以为西文概念“nation”专指“语言文化共同体”，是当代中国学人的

重大误解。这误解不仅导致知识陷阱，而且导致学术乌龙。“Nation”被看作“语言文化共同体”，源于这概念内涵的历史流变。

起初，“nation”并未强调“语言文化”，只是默认欧洲传统封建领地的疆界为国土疆界。欧洲封建领地里包含多种语言文化。罗马帝国被日耳曼各部落肢解后，各种日耳曼语与其他欧洲语言逐渐混合成“方言”。从中国视角看，欧洲的多种语言远不及中国“方言”数量众多。若用字母文字准确拼写天津话发音，北京话与天津话的差别未必小于俄语和乌克兰语的差别。

然后，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的美洲开始，“民族解放运动”兴起。“民族解放运动”是摆脱欧洲各殖民帝国统治的“建国运动”，建立独立的“nation”，即政治共同体。哪些群体有资格成为“nation”？需要先“认定”国民。中文初译“nation”为“国族”，二十世纪中期统一译为“民族”。于是，“语言文化共同体”成为认定“民族”的主要标准。这里，“民族”实指政治共同体，是尚待建立自主政权（state）的“国家”。于是，认定语言文化差异就是认定“国族”。然而，如此人为“认定”的国族，天然规模小，生存力低。语言文化差异显然不是美国从英国独立、建立自己独立政治共同体的原因。事实上，英国人与北美13个英属定居区殖民者的语言差异，小于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语言差异。支持美国独立建国的重大势力是英国的死敌法国。

再然后，到20世纪中后期，欧洲殖民帝国不复存在，“民族解放运动”结束。此时，所有大中型政治共同体都包含多种语言文化共同体，但也都努力让本国通用语言和通用法律成为“主流”，以使“政治”共同体拥有较强“内聚力”。从此，“nation”就是“政治共同体”。没有独立政权的“语言文化共同体”不会被承认为“nation”，不能加入“United Nations”（联合国）。

21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什么？是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分裂运动，多与“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相关，大体由外部强国挑动。这种曾经针对欧洲殖民帝国的进步运动，而今是反动的。

概言之，西学曾视“nation”为“文化共同体”；但而今指称“政治共同体”，指称有独立政权的“国家”。所以，“United Nations”（联合国）不是“文化共同体”间的组织，不是“民族”间的组织，而是“国”际组织。

而今欧美人普遍认为，政治共同体“nation”包含多元语言文化。希特勒才鼓吹纯种、单一语言文化的“nation”。连偏居斯堪的纳维亚

半岛、原先与“纳粹”关系密切的北欧各国，而今也盛行多元文化。美国总统常挂嘴边的“We American nation”，指的是“我们美国”或“我们美国人”，并非标榜单一文化。事实上，绝大多数美国人为美国是个拥有多元移民文化的政治共同体而自豪。所有美国家庭移居美国的历史，迄今都不超过四百年。

“Nation state”又是什么？那不是指单一语言文化共同体的政权。“State”是政府“government”的抽象词，正如中文以“政权”作为“政府”的抽象词。在联邦制下，“州”政府也是“state”，联邦政府（federal government）的抽象词是“nation state”，也就是“全国政权”或“中央政府”。直到“国家”消亡、世界实现大一统，“nation”和“nation state”都不会“过时”。

中国曾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内部“认定”出56个“民族”，不分“nation”和“ethnicity(族裔)”。中国学界的重大误解是将“nation state”视为特定语言文化共同体的政权。

简单概括。中文的“国家”，原指国土、国民、政权三位一体的政治共同体，但而今中国学界以“国家”指称“政权”（state），几乎放弃了中文“国家”的本意。西学“nation”的原义是“国民”，而今则指称“政治共同体”，即中文“国家”的原义。

澄清中西“国家”概念的流变，是推动知识进步的第一步。

2、引入“政治共同体”概念的两大原因

由于两大原因——解决概念混乱和知识突破问题，政治学需要引入“政治共同体”概念。

第一，使用“政治共同体”概念能消除“国家”与“政权”混淆而致的“知识乌龙”。

西学忽视政治共同体的学理意义，仅强调政权（state）与社会（society）两分，并以社会为原因，集中讨论作为政治结果的政权。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中文的“国家”专指“政权”，称西学的“政权理论”为“国家理论”，引发了知识混乱。中译的关于“国家与社会”（state and society）的大量西方文献，讨论的其实是“政权与社会”。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实指“政权与革命”。

而今，中文把“nation”译作“民族”，理解为“语言文化共同体”，而非“政治共同体”。于是，“次文化共同体”也是“民族”，是“少数民族”，而非“少数族裔”（ethnic group）。而作为“政治共同体”的

“nation”被译成两个词“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又被理解为民族的政权“nation state”。混淆“nation”与“state”导致了一堆荒诞，并盛行“民族国家”（nation或nation state）“过时论”。

美国过去曾有个别学人称，“中华不是个nation”，意指中国境内有很多“次文化共同体”。其中隐含了“民族解放运动”式的指责：即中国与近代欧洲的殖民帝国类似。中文将其译作“中国不是个民族国家”，从而被理解为“中国不是个全国政权”（nation state）。于是有中国学人反击：中国虽不是个“民族国家”，却是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甚至还流行如此胡扯：“中国是个伪装成国家（nation）的文明（civilization）。”换言之，一个说“nation”（国家），一个讲“state”（政权），鸡同鸭讲，无端制造了个学术大乌龙。谁会拒绝承认西方政权（state）也基于“文明”？

当今许多中国学人持“民族国家过时论”，却不知自己在说什么；是“国家”（nation）过时，还是“政权”（state）过时，或全国政权（nation state）过时？这又是个学术乌龙。谁会说“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过时，或中华“全国政权”（nation state）过时？二战后数十年来，欧洲各国努力建构欧罗巴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Europe）。那不代表“nation”过时，而是企图合并欧洲中小“nation”，建构国民仅持欧盟护照的大“nation”，人口多达5亿的超大型政治共同体。

一些中国学人喜欢把（传统）中国称为“中华帝国”。称谓貌似洋气，却食洋不化而落入知识陷阱，把中国当成过气的西方殖民帝国。在当代政治共同体内鼓吹“特殊文化群体”（ethnic group，族裔）的独立政治权利，明显违背历史潮流。

更大的知识乌龙出在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国际关系向来以“关系”为研究对象，集中解释“国家间的”（inter-national）战争与和平。国际关系不研究“关系”研究什么？问题是什么与什么的“关系”。

所有“存在”当然都是“关系”的结果。这是常识而非知识。但不同的结果来自不同种类的关系。男女关系制造孩子、师生关系传授知识、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创造产品、国家间的关系催生政治共同体间的战争与和平。把所有“关系”混为一谈是“哲学”。讨论先有“关系”还是先有“关联者”，是哲学“本体论”问题。把“过程”混同“理论”，创造“过程学派”，也是类似。

一些中国的国际关系学人，把“国家”混同“state”，把“nation”理

解为“文化共同体”，混同于语言文化的“社会”（society）。于是，“国际关系”变成了“政权与社会”（state and Society）的关系，而且是文化关系、观念关系。

原产于欧洲的“政治社会学”，以文化意识为原因变量讨论“政权与社会”（state and Society）的关系；并非关于“国际（international）”关系的学问。

袭用欧洲的“政治社会学”理论研究“国际”关系，“nation”从定义上就不存在，当然“过时”。袭用那种欧洲理论并没创造出国际关系理论里的“中国学派”，或“关系”学派，或“过程”学派。那不过是对欧洲政治社会学知识的误读；更来自概念混淆，混淆西文的“nation、state、society”。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里有“建构主义”学派。其两大核心有毒：一是用文化观念解释一切，故意忽略物质生产，属于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二是把西方国家的世界霸权认作“有政府”的政治，由西方“普适价值”主导。于是，仅美国才有发动战争的“合法性”。

跟随这“建构主义”，有些中国的国际关系学人大谈“价值观建构”的“历史过程”，自诩创造了“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新理论。

社会科学是实用科学，不是哲学，更不是玄学。用哲学或者玄学取代“国际”知识，就不可能、甚至不屑于解释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不解释“国家”（nation）间发生热战和冷战的历史与现实。

理论是因果关系及其发生机制的抽象，不是“过程”描述。中国革命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过程”明显是两件事。确有西方学者大谈“过程”高于“理论”，类似我国争议“实践重要还是理论重要”。那不是“学派”。学派指的是独树一帜的因果知识体系。

国际关系不是人际关系，不是阶级关系，也不是意识形态关系。古今中外，无论政权“性质”为何、信奉什么“主义”，政治共同体依赖国防军生存。政治共同体的安全，即“国家安全”，是根本的“国之大事”。兵器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技术。人要吃饭，子弹能杀人；枪炮本身不分“主义”，落后就会挨打。

“Nation”是“国家”或“国族”，即政治共同体，不是“语言文化共同体”。译“nation”为“民族国家”，是蛇足。“United Nations”只能译为“联合国”，不能译为“民族间的组织”。“Nationalist Party”译为“国民党”是正确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西文本意是“国民主义”；译成“国家主义”或“国族主义”也对，但在今日中国会被误读为

“statism”（政权主义）。“Inter-national”的政治是“国际”政治，译作“民族”间的政治是错的；译作“民族国家”间的政治则会被误认作“政权间”（inter-state）的政治。把“nation”译为“民族”原本将就，但必须指称“政治共同体”，如“美利坚民族、中华民族”。而且必须明确：“nation”内部的“少数民族”指的是次文化群体“族裔”（ethnic group）。美国的华裔或中国的朝鲜裔，与“nation”无关，是“ethnic group”，不是“minority nationality”。在政治共同体内部，特殊的语言文化群体没有、也不能有，特殊的政治身份。特殊政治身份有相互歧视嫌疑，国民身份平等才是历史潮流。

为澄清政治知识混乱，为准确表达政治知识，中国学人应特别注意区分“国家”与“政权”。凡提到“国家”的中文文章，先应澄清究竟指“政权”还是指“政治共同体”。

然而，很遗憾，中文文献以“国家”指称“政权”，已经约定俗成。所以，本文被迫以“政治共同体”指代国土、国民、政权三位一体的“国家”。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以前，三位一体是中文“国家”的本义。

“政治共同体”的英译应是“nation”。但这英译不尽准确。因“反封建”的欧洲近代史，“nation”至今隐约还有外在于政权（state）之“民”的古旧含义。因此，作者倾向使用“political entity”。为何不直接用“political community”？笔者为此踌躇许久。西文讨论“community”的文献汗牛充栋，包含彼此矛盾的价值取向。在中文里，“共同体”的含义简单、清晰，仅指“互助的群体”。在本文里，中文用“共同体”，西文用“entity”。

引入“政治共同体”概念，能化解知识乌龙，更意在推进知识。

第二，“政治共同体”有助于扬弃现有的中西理论知识，建构以“政治共同体为基本单元”的新知识体系。

什么是“现有”知识？

对西学而言，“nation”（政治共同体/国家）仅产生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即17世纪中叶以后，此前没有“国”，也就没有“国际”（inter-national）关系。当代北欧少数自认为研究“国际关系”的学人还忙于解构“nation”。更有西方人类学/社会学学者，把这欧洲近代以来才有的“nation”仅视为基于“观念”的共同体。

西人习惯于西方的思想和政治军事霸权，特别是基督教大一统，眼中没有非西方的政权和政治共同体。所以，近代以来的世界就被看作“有政府”的世界，向来由“西方文明”主导甚至统治。对不少欧洲

政治学者而言，世上没有“国际”，只有“内政”。政治理论的建构，即史观的建构，基于“无外”的内政。毕竟，基督教会统领的精神世界，始终伴随中世纪欧洲破碎的封建领地。

由于“基督教文明”主导近代以来的世界，英国历史学者汤因比（1889—1975）把世界史看作“文明”竞争史，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1927—2008）也大谈“文明的冲突”。他们谈论的“文明”，主要是语言文化，甚至就是宗教文化，看哪个更“文明”或更“野蛮”。

貌似例外的是19世纪的英国学者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依照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斯宾塞创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他认为社会内部从简单到复杂的“功能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导致“优质”社会，即英美式的自由民主社会。优胜劣汰，英美社会因精致的“功能分化”（民主）而优于（专制的）日耳曼社会及日本社会。斯宾塞的分析单元是“社会”。他认为社会功能越多元分化，社会就越先进。可以说，他的理论属于古典自由主义，是支持多元“民主”政治的理论。从政治共同体出发，会强调社会团结；从生物进化出发，会强调社会分化。两者思路相反。

简要比较说明中西“现有知识”如下：

自古希腊城邦时代以来，西方史观，即西方政治理论，强调分析“政权与社会”（state and society）的关系。20世纪晚期，美国政治学还一阵子时髦“带回政权”（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另一阵子时髦“带回社会”（bringing the society back in）。在西学里，政权（state）基于社会“上、中、下”阶级或社会利益集团的组合（social configurations），拥有特定社会组合的“阶级性”及“文化性”。所谓“文化性”指的是“群体认同”，即共同的历史叙事。换言之，西学认为：社会变迁决定政治变迁；一切重大政治结果皆由“社会”解释，归咎于“本届人民”。

自春秋时代以来，中华史观，即中华政治理论，也强调分析“政权”与“民”的关系，类似西学的“政权与社会”关系。然而，“民”虽分“士农工商”四类职业；但“富不过三代”，“四民一体”，由官方“编户齐民”。中华只分“官”和“民”：“民营私，官奉公；民传子，官传贤”。“私”致力于“小家庭”的育小养老；“公”致力于组织“大家庭”育小养老的互助。“大一统”是“家国同构”的政治共同体；由小家而大家，由大家而国家，政体呈官权至重的“同心圆”结构。于是，一切重大政治结果皆由“圆心”的“质量”解释，由政权执掌者“谋私”还是“奉公”解

释，不能归咎于“本届人民”。

两者有明显共性：都强调“政权”与“民众”两分。西学把“民”分成不同的阶级和利益集团，统称“社会”。中国不愿区分“民”或“社会”，强调以“质量高低”区分政权。

两者的区别也很明显：中方强调政权“质量”的决定性作用，而西方强调社会“自由”的决定性作用。中华迄今强调政权，强调政权的先进性决定政治共同体的治乱兴衰，还认为“政权合法性”颇多系于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大一统”，即《民劳》中的“国无有残”。西方则强调“社会分层”、强调分属不同阶级民众的利益差异，强调上、中、下层社会政治文化的“观念”差异，并以社会集团的自由博弈为政治进步的动力，甚至以“被压迫阶级的自由解放”和“被压迫民族的自由解放”为历史进步主要动力。

人类社会变迁的主动力究竟来自“政权质量”，还是来自为“阶级自由”而进行的“阶级斗争”？这争论永远没有结果，也就不再能推动知识进步。

中西双方共同的知识盲点在于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

“政治共同体”概念提供了一条突破“政权与国民”即“政权与社会”两分的途径，开辟认识历史的新途径。超越中西史观，建构以“政治共同体”为基本分析单元的理论，是本文主旨。作者认为：“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生存竞争”是理解历史变迁动力的钥匙。这把钥匙把“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统一在一个认识体系里。

强调“政治共同体”作为整体，讨论其关于强弱胜负的竞争，就会承认汉朝毁于长城内外的竞争、罗马帝国毁于罗马同日耳曼各部的竞争。这不是“阶级分析”或“文化分析”。

强调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生存竞争，还可以统一“国内”与“国际”分割断裂的知识体系，更有力地解释世界各地实用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社会变迁和文化观念的演化、以及政治设施和法律体系的进化。

迄今的一般理解是：“政治”主要发生在“国内”。“国际政治”则发生在“国家间”，是“inter-national”的政治，是政治的“另类”。尽管“国内”与“国际”密切相关，却是分属不同逻辑的“两个大局”。不少学人认为：冷战后，1990年代初开始，由于苏联崩溃导致“全球化”加速，才促成了“联系”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思维方式。

区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基本逻辑是：前者是“有政府的”政

治，后者是“无政府的”的政治——有国家间的“国际”组织而无国家之上的政府。因此，“国际政治”以“nation”为基本操作单元和基本分析单位，而“国内政治”则以“阶级/利益集团”（包括“统治阶级”）为基本操作单元和分析单位。

全世界的政治学人都有国际与国内两分“不合现实”的直觉和不满。但中外学界首先想到的是：用“国内”政治逻辑解释“国际”政治逻辑，使两者统一。

共产党人率先强调国内结构与国际结构的统一性。马恩强调以“阶级压迫”划分世界，列宁斯大林强调以类似阶级划分的“被压迫民族”划分世界。列宁主义是当代“世界体系”理论的基础。

一些当代欧洲学者，特别是北欧学者，把“国内”看成“国际”，视国际政治为“有政府”的政治。那更多是基于意识形态甚至宗教的西方霸权，当然也基于历史事实上的全球军事霸权。

但是，用“国内”的阶级或意识形态取代作为政治共同体的“nation”，真能解释世界的或“国际”的政治？用“文化意识”或“意识形态”霸权，或能像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那样解释“国内”政治；但也能解释“国际”政治？

为什么不可以颠倒过来，用国际政治逻辑解释国内政治逻辑？

国际关系里“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就“国际”关系而言，“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彼此打世界大战，“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间也发生惨烈战争。同样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中国和越南在上世纪80年代打了长达十年的“边境战争”。正因为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对峙，才有了中美长达半个世纪的“蜜月”。有中国学人认为：中苏对抗，因为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美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间的结盟未必与国家“阶级性质”有关。日本与苏联签订中立条约，对美国发动战争，就有了美中联手抗日。美国占领阿富汗二十年，是两国政权的哪种“阶级性”而致？

用文化和政治观念的差异区分政治共同体，更难令人信服。各种“主义”发生在同时代的同一国里。在整个19世纪，美国的最大敌国是语言文化几乎相同的英国，而最大的盟友是英国的竞争对手法国。成熟的“社会主义”观念产生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西方学人判断：中国不够“资本主义”，不够尊重市场机制和维护产权界限。但有中国学人认为：欧洲的国有经济成分和国家税收的税率比中国高

得多；中国比欧洲更强调市场机制。有西方学人判断中国不“民主”；但有中国学人认为：中国比西方各国更“民主”。中国奉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世界上也有不少国家自认奉行“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英国16世纪末开始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圈地运动”；但女王政府同时推出了《救助新贫困法》。新加坡的“资本主义”登峰造极，但新加坡的“立国之本”却是基于土地国有的“居者有其屋”政策，即“组屋”政策。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明显倾向工商资本，却早于苏联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全民福利体系。德国的“立国之本”是基于“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 economy）的“阶级合作主义”（corporatism），几乎类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Corporatism”意为政权主导的劳工与资本家合作，类似职业经理人管理的“股份公司”。中文译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将“corporatism”译为不知所云的“法团主义”。德国的“阶级合作”模式塑造今日欧洲政治，远及加拿大和新西兰澳大利亚。不是德国特别强调“阶级合作”，而是阶级性和“主义”标签让学人忽视英国和美国的国内“阶级合作”。

近代以来，“国际政治”主要是盘算“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的“地缘政治”。“地缘政治”是关于政治共同体“规模”的政治，即地理相邻相关国家间的政治。近代以来，地缘政治的焦点既非陆权、亦非海权，而是“出海口”控制权。大英帝国衰落到连苏格兰都难保，却依然不肯把地中海出海口还给北约盟友西班牙。通往日本海的出海口，关系到成亿中国东北人民的福祉，关系到中国重大国家利益。但无论清朝变成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俄国变成苏联还是俄罗斯，两国的“阶级性质”丝毫不影响这个事实：俄方已经获得中方的日本海出海口，就不会再松手。作为大国，中国长期对“出海口”的理解至为迟钝。但在21世纪，被迫发现了“地缘政治”精髓，中国追求出海口的强烈程度不亚于任何国家。

基于“无政府”逻辑，西方已有相当成熟、独立的“国际政治”理论；不少大学专设独立于“政治系”的“国际关系学院”。美国学者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 1924-2013）建立了迄今解释力最强的“国际”政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在他看来：国际政治受“无政府”的丛林法则制约，规律简单，所以能抽象出简约的“国际结构”理论，从而解释一半的国际政治行为。他归纳的“规律”是：国际行为受国家间相对的物质实力对比塑造。他承认：国内因素严重影响国际行为，是国际行为的另一半原因。但他认为：国内因素太多、更太多

偶然，几乎不可能归纳出包含国内因素的“国际政治规律”，即不可能理论化“国际行为的国内因素”。

如何解决“国际规律”对国际行为解释力明显不足的问题？华尔兹的答案是：不合“国际规律”的行为固然多；但国际规律惩罚这种行为，使之付出国家（nation）衰落的代价。

然而，何以不合“国际规律”的行为依然占国际行为的一半？美国学者杰维斯（Robert Jervis, 1940-2021）讨论了国际关系中的“误判”（misperception）。那属于准心理学解释；先有主观判断的结果，然后才能区分各占一半的“误判”和（正确）“判断”。

华尔兹开设“国际政治理论”和“军事战略”两门博士课程。自修习他的这两门课，笔者就开始困扰于国际行为与国内复杂因素的关联。留学归国之初，受中国史从西周“封建大一统”到秦汉“郡县大一统”的启发，笔者曾设想以一条“轴线”（spectrum）替代“国际结构”和“国际体系”。轴线两端是单极“帝国”（empire），中间是独立国家。单极“帝国”经不住无序竞争的压力，礼崩乐坏、分崩离析，就会开启“春秋时代”，导致“国际”政治。因为生存竞争，国家规模越来越大、压力越来越强，国家数量就越来越少，从而开启“战国时代”，成为“多极”世界。“多极”最终将回归类似“帝国”式的“单极”。

笔者曾当面向华尔兹求教上述假设成立的前景。他不悦地反问：“你想颠覆我的理论”？老师指望学生支持甚至发扬光大老师的理论，中外皆然。中年华尔兹曾向老年摩根索问安，问及其肾疾。摩的回答也类似：“我的肾还可以，但心碎了”。摩氏“心碎”，乃因华氏公开批评摩氏困于冷战意识形态，缺乏“国际结构”视野。

其后，笔者致力于比较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内政”，搁置了探讨“国际政治理论”。用相对物质实力的“结构”解释现实，比任何其他理论有效得多。我国称“国际结构”为“国际格局”；并认为“国际格局”正在发生巨变，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就引发战争危险。战争危险导致“底线思维”，视唯心主义为脱离实际的“天真”。

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理论崛起于批评华氏理论。照抄华氏精致简约的“国际结构”，却把相对的“物质”实力结构改成相对的“观念”势力结构，把意识形态“带回”国际政治研究的中心，宣扬彻底的唯心主义。而今建构主义的典型应用者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和他的顾问于茂春大力区分“中国人民”与信奉“特殊意识形态”的中国共产党。于是，中美博弈被说成两种“政治价值观”的博弈，为美国对华

发动“新冷战”辩护。中国国内也有“左、右”两派学人强调中美对峙源于迥异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幸而被中国官方拒绝。

学者擅长观念，天然喜欢强调“观念”的作用；但外交部和国防部每天体验弱国无外交，更懂得“物质实力”的作用。

基于漫长宗教史，有西方学人称“物质利益”全来自“观念”，并不奇怪。但奇怪的是，当代中国有些国际关系学人认同那唯心主义的说法。的确，只要有虔心向佛的执念，和尚尼姑可以在深山寺庙里生活，灭人欲、抛家弃子。然而，未经一神教宗教文化浸染，中国学人怎能无视世上绝大多数人在人欲物欲中“过日子”的历史和现实？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无论强调“物质”还是“观念”，都属于西学的理论成就。讲两者不同比例的混合，不是理论，而是实践。

时光飞逝，转眼过去二十余年。笔者的新疑问是：“有政府的”国内政治是否也由“无政府的”国际竞争驱动？用“无政府”这国际规律解释国内“有政府”的社会演化如何？本文的答案是肯定的。若这假设成立，当足以告慰华老师在天之灵；但立不起来则另当别论。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抵抗无序压力，保持内部秩序，就要有较强的“内聚力”，就要“祀”。原始的“祀”，从生殖崇拜到万物有灵，到集中于几种不同颜色的不同动物，如“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现代的“祀”，包括国旗、国徽、国歌、制服、法律和全民选举仪式在内，比祖先崇拜和单一神崇拜精致复杂得多。无序压力来自哪里，何以需要越来越强大先进的“戎”？南美洲印第安人社会和太平洋岛民社会并无“祀”与“戎”的进步。那里缺少“敌国外患”，也就缺乏“无序”压力，直到被欧洲殖民势力“同化”。

现有理论声称：分析国内政治要“注意”国际因素；分析国际政治也要“注意”国内因素。“两个大局”的“关系”，显然以“两分”的国际与国内大局逻辑为前提。

视“政治共同体”为基本分析单元，驱动国际、国内变化的动力就是同一个，即“无政府”压力。有序的国内政治在因应失序的压力中踟蹰前行，彼此交流、相互促进，“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就成为有机统一的知识体系。

仅仅分析英格兰的社会分层状况，不可能找到大英帝国兴衰的主要原因。而且，“内因”与“外因”两分，内因决定外因，并非先进的认识论。五千年来，自城邦时代以降，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生存竞争塑

造政治共同体的兴衰演化。竞争塑造“内因”和“外因”。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自改革开放以来放弃“阶级斗争为纲”乃至“阶级斗争”？阶级斗争驱动中国历史的判断明显可疑。“炎黄时代”大型部落联盟间的战争、游牧与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对峙、“小邦周灭大邑殷”实现封建大一统、“秦灭六国”实现郡县大一统，都是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的斗争，是哪个阶级战胜了哪个阶级？

中华史并非“例外”。一部欧洲史是“阶级斗争”史？从“雅利安征服”到希腊城邦、到罗马帝国、到罗马帝国被日耳曼各部摧毁；从文艺复兴和大航海到制造业取代农牧业；从清教徒跨大西洋而来到而今的美国；是哪个阶级与哪个阶级的斗争，哪个阶级战胜了哪个阶级？

历史是真实发生的事。史观不是历史，而是历史哲学。史观指导筛选史实，目标是弘扬某种政治理论和价值观，强化某种“历史叙事”。**史观是政治理论，政治理论就是史观。**世上不可能有、也从未有过、不以历史为据的政治理论。比较中西历史，当代中国学人或可有独特视角，继承和超越中外已有的史观，构建新颖的政治理论。

在建党百年时，中国共产党正式确认了自己的新史观：党的“初心”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使命”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都是为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中国共产党称这新史观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

顺便提到：由于“nation”而今有清晰的“国际法”地位，引入中性的“政治共同体”概念，还能剥去国际法外衣，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大型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生存竞争。塞浦路斯位于地中海东北角，是亚洲境内唯一的欧盟国家，人口约百万。岛国北部存在一个割据势力，有十几万人口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我们不可能仅从“内部”理解那岛国的政治。虽然仅土耳其一国承认那“共和国”独立的法理地位，称之为“政治共同体”则无国际法障碍。在法理上，科索沃迄今仍属塞尔维亚，不是个“nation”（国家）。但在学理上，科索沃是独立的政治共同体，背后是欧盟和北约。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建立的以瑞金为都城的“割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是政治共同体。在法理上，台湾是中国一个省。在事实上，中华统一大业“尚待”完成。视台湾岛为中美两国博弈的战场，才能理解台湾社会及其

存在。

二、拆分“政治共同体”的学理困境

本节有三个目的。一是通过澄清基础概念，指出政治学是“关于政治共同体的学问”而非其他。二是说明，不断细致拆分政治共同体的分析方法已穷尽其学术潜力，不再有助于获得新知。三是借分析西学压倒中国传统政治知识的原因，说明建构现代政治理论的方法。

1、政治学是关于政治共同体的学问

城邦是最初级的“政治共同体”。如此，政治共同体有约五千年历史，并非始于17世纪中叶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政治学包括、但并非仅是关于“政权”的学问。政治学是关于“政治共同体”的学问。古希腊文“城邦”是而今西文“政治”的词源。**城邦就是政治，政治就是城邦；有城邦才有政治，城邦之前没有政治。**“国”不仅包含政权，而且包括“四方”国土和国土上的国民。“国”字的原义如此，西文“政治”的本义也如此。

因获得种植/养殖新技术及农产品剩余，狩猎采集部落开始定居，建设“城池”。比起“封建领地”和“国家”，“城邦”规模很小，也不稳定。“城池”由四种建筑构成：一是宫殿，体现政治权威；二是庙宇，以共享的历史叙事凝聚精神认同；三是广场，昭示一起“过日子”的历法和社会规范；四是阻止外来侵掠的深沟高墙，即后世的“国防”。

放弃“城池”，可能因为内部分裂、因土地肥力递减而被迫“游耕”、因持续干旱或城池被洪水淹没，但更可能因为“外来势力”入侵。人口多了，要扩张土地，城邦之间就“相邻”，发生“地缘政治”。城邦生存与“全男皆兵”及武器进步密切相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以色列国迄今要求“男女皆兵”，男子服役三年，女子服役两年。

无论中西，当代政治学人大多同意：政治共同体由“国民”和“政权”两大要素构成；我国学界现称“国家与社会”。

不得不顺便提到，以为“国土”相对固定就忽略之，直接导致政治学人忽视“政治共同体”。国民生活在国土上，没有国土谈不上国民。而且，国土并非固定不变。没有武装力量严格守卫，国界就是层窗户纸。自古以来，所有政治共同体每分钟都在为守卫和变更国界支付沉重代价。所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暂且不提国土被政治学界忽略，先只谈国民与政权。自古至今，所有人都困惑于如斯疑问：是“**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权**”，还是“**有什么样的政权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换言之，社会状态究竟是政权状态的原因，还是结果？这疑问不仅体现中西政治知识的基本差异，更展示这争论不可能有结论。

寻常的答案是政权与社会“互为因果”。固然，“互为因果”是事实，却是理论新知的死敌。逻辑上，“互为因果”有同义反复（tautology）嫌疑，让知识在死逻辑里打转，无法进步。世界各地的家长以“鸡生蛋，蛋生鸡，哪个在先”的悖论，展示“逻辑死循环”，刺激自家孩子的逻辑认知感觉。

政治学常被批评为学科“不成熟、不科学”，原因不在能否采用“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本质上不同，而在对学科基础概念间的因果关系含糊其辞，声称“互为因果”。

除非政治学跳出“政权”与“社会”两分的假设，增加第三个概念，上述疑问永远无解。新概念是解决“悖论”的唯一途径。

欲跳出“政权与社会”两分，先要澄清政治学基础概念。

什么是“共同体”？“搭帮互助”的群体就是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是经济互通的互助群体；宗教共同体是跨地域宗教人士的互助群体；文化共同体是讲共通语言的人抱团取暖的互助群体；部落、村落是血缘同宗的许多小家庭“搭帮过日子”的互助群体。

什么是“政治”？一切涉及“政权”的事都是公事，都是政治；无涉“政权”的事是私事，不是政治。结婚生孩子貌似当然的私事。但找政府领《结婚证》、《准生证》，私事就变公事，就涉及“政治”。领了《结婚证》，离婚时各自的权益由政权保障。婚育是民生之本，关系政权兴衰，是重大政治。《婚姻法》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

什么是“政治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是在一定地域内有“政权”统领的、搭帮“互助过日子”的**民众群体**。城邦是最初的政治共同体，游荡的狩猎采集部落不是，没“都城”的村落也不是。

为什么用“政权”而非“政府”？“政府”内涵狭窄，有时甚至仅指不含立法和司法机构的行政机构，还可能不包括政党执政系统。“政权”指称公权的本质特征，即对暴力和税收的“垄断”。

什么是“政权”？什么是“权力”？权力是支配他人的能力。支配力仅有四类来源：财富、暴力、思想、（支配者的）人格。财富和暴

力是硬支配力；思想和人格是软支配力。政权存在的核心特征是硬支配权。在任一群体里通过垄断暴力和税收来领导这群体的机构就是“政权”。以江西瑞金为都城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以暴力和税收垄断实行“割据”，与“中华民国”不兼容。

政权是有强制性的。因为垄断暴力和税收，所有政治共同体的政权都对国民有强制性、压迫性。古希腊文“城邦”是而今西文“政治”的词源；但西文的“警察”与“政治”亦同形。自城邦以来“政治”最重要的本质就是政权垄断暴力。

顺便提到，什么是“政权”不能干涉的“个人”之事？由于存在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生存竞争，“群己权界”是笔天然的糊涂账，基本属于“神话”。界限的弹性来自政治共同体生存危机的大小。欧洲很多人以“神话”支持关于“无政府”的、每个人的“自由”向往。然而，市场机制依赖的“产权”界限，即市民/资产阶级的“法权”，只因被“警察”保护才成立。支持市场机制却宣扬“无政府主义”，无异于宣扬丛林法则。以取消私有制为前提，马克思主张“自由人的联合体”。有中国学人宣扬推进“自由人的联合体”，却闭口不提马克思的前提条件。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市民小资的“自由情调”。

由基本概念的定义看，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两分”政权与社会的理论框架，集中讨论两者关系。于是，“硬支配权”标志政权存在，“软支配权”决定政权寿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垄断了税收和暴力，政权会逐渐习惯于金钱收买和暴力压服的硬支配权，就难以长期保持出色的思想和人格。因此，政权有更替，国家有兴衰。

对政权“寿命”的上述解释非常有力。但最大的漏洞也在于此。貌似“文明、复杂”的政治共同体常被貌似“野蛮、简单”的政治共同体终结。当下西方各国恶化对华关系，并不来自其对“中华文化”的好恶，而来自对中国规模、内聚力、生产力的恐惧。中国为什么要从英国手中收复香港？中央政府并不掌握香港特区政府的税收权和警权，为什么取代英国在港的驻军权和外交权就是“收复”？

一旦引入“政治共同体”概念，政权与社会“两分”就要受制于“三”，受制于政治共同体的“竞争力”，即相对他国的规模、内聚力、生产力。“规模”是第一要素，由人口数量和国土面积综合而来。

“治乱兴衰”是最受中华大众关注的事，也是著述三千年中国政治史的主线。“治”与国“兴”紧密相连，“乱”与国“衰”密切相关。

何以治乱兴衰？《孟子》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

患者，国恒亡。”这是此文新型理论假设的起点。

换言之，政治学包括、但并非仅是关于“政权”的学问。政治学是关于“政治共同体”的学问。

2、细致拆分政治共同体无助于获得新知

政治学是“关于政治共同体的学问”。但政治学界普遍认为政治共同体由“国民”和“政权”两大要素构成，略去“国土”的地缘政治压力，忽略“国无有残”的民众渴望。于是，政治学界倾向以拆分“国民”与“政权”来获取更有解释力的因果知识。如此，苏联的下场被政治学界普遍理解为政权不合社会，从而冷落地缘政治因素，忽略中国在“冷战”中迫使苏联两线作战的作用。

迄今，细致、更细致地拆分政治共同体的“内部结构”，是获得政治知识的主要手段。“内部结构”指的是“政权”与“社会”/“国民”。

政治学拥有很多种拆分“政权”的办法：中央、地方、司法、行政、立法、家族继承、部门分权、定期民选、法治或人治、民主或专制、一党、两党多党，等等。把“政权”的拆分组合起来，能得出很多结果，能用于区分“政权类型”（regime type）。但“政权类型”能解释什么？把海地政权与新加坡政权归为同类，能解释什么？若非军事同盟关系，把德国、英国、日本的政权归为同类，实在奇怪。

借助社会学/人类学概念，政治学还拥有很多种拆分“国民”/“社会”的办法：个人、性别、年龄、信仰、习俗、宗族、部落、团体、职业、城乡、收入、地域性语言文化、上中下层社会地位，等等。把“国民”的各种拆分组合起来，能获得无数结果。比如，某青年男性、无婚姻子女、信万物有灵的萨满教、能讲英语、专门捕捞海产、有很多钱，是阿拉斯加的一个因纽特（爱斯基摩）人。他倾向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精确计算到每位选民，似能算出谁当美国下届总统或两党中的哪个党能赢得国会两院选举。然而，二赌一、赢面概率大于五成，章鱼或蟑螂也能做。

再把“国民”与“政权”各自的无数种拆分结果组合在一起，甚至建立“数据库”输入计算机做“回归”或“仿真模型”，就可以生产海量的论文和著作，得出无数种“政权”与“国民”关系的因果判断。

到目前为止，我们得到的最重要结论是：美国习惯于官权分散，强调社会自由；中国习惯于官权集中，强调政权质量。

然而，我们还知道：把中国体制移植到印度，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印度一天也活不下去；把印度体制移植到中国，作为政治共同体的

中国同样一天也活不下去。于是，我们倾向接受“社会决定政权”。

但是，再看中国今日欣欣向荣、从极端落后迅速追赶世界第一富强之国的势头，没人会否认“党的领导”是关键因素。当然，再看到第三世界政权普遍的落后腐败，我们又倾向于接受“政权决定社会”。

继续对“社会”和“政权”做无限的拆分组合，有助于我们获得新的政治知识？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权”还是“有什么样的政权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回答不了这疑问，无论中西，政治学知识的前途相当黯淡。

把政治学变成数据统计学，更会把政治学带入死胡同。政治学者专注于拆分出来的细致数据统计，政治学离“政治”就渐行渐远。

抛开当代拆分组合“社会”与“政权”的无数精致论文和著作，我们先回到中西政治知识体系的本源。中西在各自孤立的地理范围建构了双方各自独立的政治知识。

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强调“官、民”两分。官之“好、坏”，即“奉公”或“谋私”，解释政治结果。西学政治知识也强调两分，由“社会”利益组合（social configurations）解释“政权”（state）性质及其政治结果。西学偶尔也用政权类别（regime type）解释社会性质，但仅限“野蛮落后”政权，而且归根结底还是一定地缘范围内的社会“野蛮落后”。

西学是当今中国的学术主流。西学强调“社会”的决定作用，也就是“国民”的作用。社会的自由，从国民个人自由、到个人自由结社、到自由结党争夺政权，塑造现代“国家”政权（state）。但有不少中国学人不接受，因为这西学理论甚至经不住当前全球两百来个政治共同体的检验。

眼下中国学界有回到中国传统学理的动向，强调政权质量决定社会质量，并以种种定性方法说明西方政权质量不及中国政权。但也有大量中国学人不接受这判断。在世界范围内，“政权质量决定论”的接受度比在中国低得多。“谁不说俺家乡好”，政权质量也是笔糊涂账，不是贴个“阶级”或“主义”标签就能分得清楚。粗看当代中国社科文献，大多认为：政府的改善取决于更多地尊重社会。

百年来，西式政治知识震撼、颠覆了中华传统政治知识，也决定了中国政学两界对西学的百年仰视。中国政治学是西学的天下，是西学译著的天下，包括西方左翼和右翼文献的译著。

“西学”何以压倒“国学”？

3、如何建构有效的“学科基础理论”

什么是学科“基础理论”？

学科基础理论表述为学科基础概念间的因果关系。因为概念的程度差异，概念成为“变量”，因果关系呈现函数式的动态“过程”。

学科基础理论包含三部分：（1）学科基础概念间的因果关系；（2）限定因果关系成立范围的前提条件；（3）关于这因果关系发生机制的简单解释。

“大道至简”，理论是极简约的因果表述。苹果掉下来，讲十五个原因的是果农，讲十个原因的是农民，讲三个原因的是普通科学家，讲一个原因的是伟大理论家牛顿。理论简约易懂，因为理论需要被讲述、应用、积累。

尽管大道至简、理论是简约的，但“论证”理论的解释力相当繁琐，需要很多人长时期进行应用实证。《共产党宣言》展示马恩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理论，极为易懂。但《资本论》论证理论，并不易读。人非自然物质，有主观能动性，各地的社会历史变动不居。世界各地共产党人抽象本地实践，不断推动对马恩理论的翻新，即“本土化、时代化”。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论证的“扎实”只能是相对、暂时的，所以社科理论都是“假设”。

社科理论比自然科学理论更拒绝“真理”。历史是事实，是合力的结果，也是无数偶然的集合。理论基于历史，解释已发生的事。史观是政治理论，政治理论就是史观。社科研究的对象是人，人可因“预见”而改变决策，从而改变结果，让“预见”不准确。现代史观基于实证式的“科学分析”，不再是宗教式的“真理信仰”。解释历史的政治理论有无数种，彼此竞争历史“解释力”。西学把有关全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解释称为“历史哲学”。

社科理论能“预测”未来？与中外许多社科工作者不同，笔者拒绝承认社科理论有“预测”功能。预测来自人类渴望确定性的本能。预测未来某事会否发生，赌五成概率，与商王用甲骨“算卦”的性质一样。国际关系学者不可能预见冠状病毒何时爆发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类似的病毒有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却可能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物质不分“过去、现在、将来”，自然科学并未“预测”未来。“天气预报”不是“预测”，而是以现有知识解释正在发生的现象，类似计算弹道飞行曲线从而预知子弹能打中目标。倘若人类社会的

未来能被准确“预测”，人类社会就没有“未来”了。社科理论解释已经发生的历史，不是为了“预测”。假社会科学家才会与“算命先生”或“未来学家”抢饭碗。

理论虽不能预见将来，却可能对后世人“解释”后世之事“有用”。理论的解释力延续到将来，说明理论质量高。理论的生命力不在事件的“预测力”，而在“解释力”。

社会科学是实用学科，来自实践，服务实践。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然而，科学知识是抽象“理论”的积累，不是实践“问题”的堆砌。

我国社科界在理论构建方面存在重要缺陷。

一方面，中国社科界蔑视理论创造的风气至今还在延续。胡适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理论”，把“理论”当成“问题”的对立面，迄今依然有很大影响力，体现出蔑视抽象知识积累的落后传统。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本土的理论创造，就把理论当成西学专利，视西学理论为学问鼻祖，甚至引用西人“至理名言”当实证。

而今中国社科界的“英语文献崇拜”有些过分。“北欧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否认存在“国际”，却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界的“显学”。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有“社会”，却没多少“国际”关系。那四、五个国家，以百万计量人口，而且几乎每半个世纪分合一次。

欲推动现有西学和国学理论的进步，需要理解“西学”征服“国学”的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西学理论基于自洽的形式逻辑，清晰地“讲道理”。

讲道理就是讲因果、符合形式逻辑。欧洲思想史把“逻辑”称为“理性”。反之，用信仰解释信仰，视某种信仰为“真理”，拒绝讨论不同的因果逻辑，就是“非理性”。当代一般理解的“理性”指的是“对成本收益的敏感性”。但这“敏感性”也基于形式逻辑，基于数学逻辑的“盘算”甚至“精算”。

因为字母本身没有含义，字母文字体系要求有定义的概念和语法。语法就是最基本的形式逻辑。既然A是B，就不能也是C。象形文字不同，以“比拟”为主，并不必然要求固定的语法和清晰的概念定义。中华传统文化不习惯“确定”的因果逻辑，因为必会“出错”。概念模糊，就能包容所有逻辑矛盾，永不“出错”。

但“不出错”的理论还“讨论”什么？没有对理论的争议讨论，谈不上知识进步。“真理”是宗教概念，上帝或安拉唯一，不容讨论，永

远正确。社科理论不是宗教，绝非“真理”。不同理论竞争的不是“对”和“错”，而在对历史“解释力”的强弱。

学术不是政治，但政治需要学术。不以学术讲政治，强词夺理，现代政权的可信度就下降。

理论拒绝含混的概念定义。常有中国学人喜欢批评别人持“非黑即白”思维，称之为“落后”、甚至“错误”的思维方式。但是，不先定义出“黑”与“白”，怎么批评“非黑即白”？《道德经》开篇就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能清楚定义的“道”就不是“道”，玄而又玄。不给出“道”的定义，不定义“名”，当然不会“出错”。《尚书》把“天”说成超自然的“神”，又说“天”就是“民”，“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皇帝对饱学士子讲“天是民”；又对无知百姓讲皇帝是“神之子”。于是，“既是，又是”。中国官学两界把“既是、又是”和“既要、又要”称为“辩证法”。然而，没有任何西学如此定义过“辩证法”。

“既要、又要”相互矛盾的两件事，意味着静止不动的“平衡点”。上级讲“既要、又要”永远正确；但下级只要“动”，就必定偏离平衡点，冒“动辄得咎”风险。两头说，永远不“出错”。实践要求“平衡”，理论要求“彻底”。“难得糊涂”属于政治实践而非政治理论。

“辩证逻辑”成立的前提是符合“形式逻辑”；不合形式逻辑的任何辩证逻辑都不可能构筑科学理论，而属于“不讲理”或“非理性”。

理论与现实不同。科学理论要成立，因果表述就必须简约到“彻底”。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形式逻辑成立的前提是清晰定义概念。西学能压倒国学，靠的是西学理论在形式逻辑上的“彻底”，也就是清晰定义概念，给出概念间因果关系的清晰表述。“社科理论”与“政策主张”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第二，西方社会的先进和富裕是事实。

西学理论的先进性貌似得到了实践先进性的支持。大批学子去西方留学，包括一度有大批学子去苏联留学，因为那些国家先进、富裕。坚信“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国人，也会去西方留学或支持子女去西方留学。即便信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类似日本的“和魂洋材”，也要学习原产于西方的先进知识。

然而，西方先进和富裕的事实可以“自证”西方政治理论的解释力？显然，对历史事实可以有多种解释，未必不能有新的、更有解释力的理论体系。

就地缘政治而言，中西双方长期隔离，一些西语至今仍以“契丹”称呼“中国”，所以中国于西方是“特例”。特例可以提供新视角。

中国不是1648年或1848年后才有。独立、巨大的中华政治共同体已经存在了三千年，是世界最大的政治共同体。中国今后还会长存，眼下更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之一。若不计争论和正式出版发表的环境，中国学者创造政治学新知识的条件是优越的。

在“第三产业”时代，中国“现代化”任务呼唤中国学人有理论创新力。从种养业到制造业到无形产品的创造业，中国而今需要演化为“创新型中国”。缺少创新能力，中国就会再次挨打挨饿挨骂。现在讲“强起来”，那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而且，“富起来”的任务也还没完成，两个“现代化”任务有重叠。出于“富强”的实际需求，我国既要“以人民为中心”，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2020和2021两年里，中国的人均GDP从1万美元达到1.2万。但同期美国的人均GDP从6万达到近7万。“社会主义”标签替代不了人均收入。我们早就明白：在政治共同体竞争生存的当代世界里，与贫穷挂钩的“主义”难有前途。迄今，中国的进步集中在引进和集成先进的实用技术，并无重大实用技术发明，遑论抽象科学理论的创新。

由此可见，中国政治学人的根本任务是创新知识，并为知识创新争取较好的出版发表环境。

第三，西学贡献了三项杰出政治知识。

西学贡献的最重要政治知识有三项：一是实用技术/生产力的进步导致社会分工变化，从而推动社会组合（social configuration）演化；二是社会利益集团间的自由博弈塑造政权先进性；三是政权先进性决定政权持久稳固。这三大贡献构成了自治的政治逻辑体系，说明“社会”塑造“政权”。反之，“政权”塑造“社会”违背历史规律，是“野蛮落后”。

上述知识体系颠覆了中华以“官”为核心的解释。在中国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理论风靡一时。在建设时期，“民权”与“官权”博弈的解释长盛不衰。中国历史上讲“民本”，指的是政权“得民心”，靠官员质量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指“人民当家作主”。一方面，中国的《宪法》和《党章》都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党章》和党关于百年党史的《决议》讲：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西学理论强调社会，对中国现代政治理论产生了重大

影响。

中国案例向来游离于西方政治学主流知识体系之外。当代中国七十年的惊人进步似乎说明“政权”塑造“社会”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对西方理论而言，中国政权是“例外”。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名家大多回避讨论中国政治；“中国学”属于一批孤独的专家。

西学三大贡献塑造了中国乃至全世界对社会历史的理解。但知识的提供者和消费者都会质疑：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权”，还是“有什么样的政权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换言之，上、中、下层国民组合的社会（society），究竟是政权（state）的原因还是结果？

政权与社会“两分”和继续不断拆分两者“内部结构”的分析方法，曾经给我们带来了很重要的知识，但而今看上去已耗尽潜力。

三、现有西学理论的解释力缺陷

西学理论的优势在形式逻辑自洽。形式逻辑并不难，早晚会像中国人熟悉自然科学那样，成为我国社科界和政界的普遍叙事习惯。

西学压倒中国学问的关键是其内容，特别是三大政治理论贡献。这三大贡献是：（1）实用技术/生产力的进步推动社会分工和社会构成（social configuration）演化；（2）社会利益集团的自由和彼此的自由博弈塑造政权先进性；（3）政权先进性决定政权持久稳固。

本节的目的只有一个：讨论三大西学贡献，说明当今主流西学有个致命的知识盲点，即缺乏对“政治共同体”生存逻辑的理解。这个盲点导致政治知识在“死逻辑”里循环。

1、政治共同体与先进技术/生产力的来源

实用技术/生产力的进步，推动社会分工演化，导致社会（阶级）组合（social configuration）进化，是个极出色的理论知识。这是中华原本没有的知识，是西学的伟大发现。

为什么西学能领先做出这重大理论发现？

制造业在三百年前的“先发”有利于创建“实用技术推动社会”的理论。在种养时代，技术进步渐进且平缓，不是社会变迁的明显因素。“开疆拓土”比精湛的种养（种植、养殖）技术更简单、经济。而且，更精湛的食品种养技术能增加人口，却难以增加人均财富量。

到尚无文字的七千年前，人类完成了迄今主要食品植物的“培育”和主要食品动物的“驯化”，有了“产业”，即“第一产业”。直到“近代”以前的七千年来，人类习惯于种养技术，也就不存在实用技术/生产力进步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因为很难看到事实根据。

在18世纪，英国率先进入“**制造**”财富时代，终结了“**种养**”财富时代。由动力机械全日制造的财富量，远超季节种养食品的财富量。

在20世纪中期，美国服务业产值首次超越全国财富生产总值一半，率先开启“**创造**”财富的时代，即创造“无形财富”的“第三产业”时代，或称“**知识经济**”时代。设计研发的无形财富远超动力机械制造的有形财富，而今甚至让“**制造**”成为数字化“**打印**”。

而今，种养业依附于“**制造业**”和“**创造业**”，不复“**天然**”。

但是，三百年来，为什么“生产力”会快速进步？为什么技术的革

命性进步总在西方先发？

西学对此的解释是：因为西方“社会”先进，即社会有了“自由”。可是，**先进技术导致先进社会、先进社会导致先进技术**，是“互为因果”的循环论证。“互为因果”让知识陷入“死循环”，是劣质假设，不可能催生有效的新知。

“以政治共同体为基本分析单元”的理论指出：技术/生产力的进步主要来自政治共同体间的生存竞争。

可以从下述三方面说明：政治共同体间的战争，是技术/生产力进步的根本动力。

(1) “先进”技术指先进军事技术，即能获得战争优势的技术。

中国人发现的是“火药”，是治病的“药”，做成爆竹能驱鬼魅，不代表先进技术。西人称“火药”为“枪粉”（gun powder）。“火药”做成“枪粉”，开创终结“冷兵器”时代的“热兵器”时代，才是先进技术。武器迭代落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但靠“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赢不下抗日战争。

战争刺激先进武器技术交流进步和创造传递信息的文字体系。

大约五千年前，浅肤色、虔心于神灵的游牧部落，渐次离开位于欧亚大陆核心的牧区，用了约千年时间先后迁徙到欧亚大陆边缘的农耕区，征服了深肤色、讲求实际利益的定居农民群体。“雅利安征服”开创了种姓制，后来演化为奴隶制、农奴制、等级和阶级制。

随“雅利安征服”而来的是战争技术飞跃：“金属工具”终结“新石器时代”；“文字体系”取代“结绳记事”，开启“抽象知识”的积累之门。只认聚落大小，就会丢掉识别“文明”的两个关键标志。“金属工具”相对“石器工具”和“有文字系统”相对“无文字系统”，标志“文明”质的飞跃。百舸争流，不进则退，“文明”后发先至，何耻之有？“古老”与当下的“先进”没有必然联系。

南美洲农耕生产相当发达，但万年印第安社会没能创造出“金属工具”和“文字体系”。几千年来，以棍棒捆石块打制的石头，印第安农耕社会始终“结绳记事”，也几乎没有武器进步。缺少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战争，就不会有武器进步和文字需求。

迟滞于“新石器时代”，中华发展出钟情漂亮石头的习俗“玉文化”。中华金属冶炼技术由何而来，何以能跨越红铜（纯铜）阶段而快速进入青铜阶段？为什么中华祖先迟至三千几百年前才创造出文

字体系，比地中海东岸地区迟约两千年？

与“雅利安征服”同期的“炎黄夏商”时期，欧亚大陆东部边缘的农耕区已有众多人口，不同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部落之间战争不断，形成了拥有辽阔战略纵深的大型部落联盟，乃至众多城邦。人口稀少的各“雅利安”部落没有“征服”中华土地和民众的机会。“鬼方”反而成为商王征服和获取漂亮石头的对象。当代中国考古界特别强调聚落大小的作用，其来有自。

为何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做起点？中国大力发展制造业的“工业革命”因何而起？为何工业技术的先进代表是“两弹一星”？

五千年来，基本逻辑一以贯之。

(2) 战争胜负决定政治共同体“生产力”的兴衰。

技术进步突破并没有发生在所有欧洲国家。

英国在16世纪末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开启了17世纪纵横全球海洋的殖民帝国，然后在18世纪领先开启工业革命。欧洲工业革命是在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的主动动力是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战争和准备战争的巨大压力。

在“立国”之战获胜前，德国和日本并非技术先进国。两国在战败后加入战胜方与新敌国的“冷战”，才保住了有限的技术先进国地位。美国原非世界的“科技王国”；哈佛大学直到20世纪初也并非世界先进大学。先有18世纪末击败英军获得国家独立，又有19世纪上半期压迫欧洲势力离开北美，再有世纪中后期的南北战争，然后才发生美国工业革命。自建国以来，美国几乎每年都处在对外战争中，美国的世界霸权是战争积累出来的。美国的先进技术既不是社会“自由”的结果，也不是内部“阶级斗争”的结果。战争让美国成为全世界的先进技术中心。而今，对华封锁一切有潜在军事用途的先进“高端”技术，是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主要手段。

(3) 生产规模并不决定战争胜负；战争胜负决定生产规模。

经济生产规模很难、而且远非必然转化为战争能力。宋朝经济规模，特别是南宋经济规模，不知大出北方敌国多少倍，可能百倍，但依然被灭国。明朝亡于仅拥二十万户的满清也一样。秦国起初是经济落后的小国，靠战争不断获得土地人口才成为大国。秦“灭六国”，灭一国，经济实力就涨一成。输掉“冷战”，苏联同时输掉“经济规模”。而今的俄罗斯坐拥中美面积之合的三洋辽阔国土，人口却仅与日本相当，经济规模不及中国广东省。俄罗斯靠什么能恢复因“冷

战”失败而丧失的苏联国土国民“规模”？美元貌似代表美国强大。但没有超级强大的美国军事力量，美元不过是美国货币，不是国际货币。“美元”是现象结果，战争力量和战争胜负是原因。

1900年“庚子”之战，仅两万多士兵的“八国联军”抢到中国“战争赔款”4.5亿两白银，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每人赔1两。若非美国和苏联击败日本，中国的“抗战”不知还要持续多久。但是，“庚子”战后仅五十年，中国贫困依旧，却能去朝鲜把3倍于八国的二十四国“联合国军”赶回到“三八线”。朝鲜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向富强的“立国之战”，从此再无相对于中国的“欧洲列强”以及让人谈虎色变的“大英帝国”。若输掉与美国的“新冷战”，中国也会像俄罗斯那样输掉“经济规模”。

判定实用技术/生产力进步与政治共同体间的生存竞争有关，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战争胜负有关，能解决“先进技术导致先进社会，先进社会”导致先进技术这个逻辑“死循环”。

上述理论判断还导致下述两个实践判断。其一，若以军事用途定义“先进”技术，就会懂得：自由贸易能获取技术，但无力获取“先进”技术。应用先进技术才有“生产力”进步。其二，质疑阶级斗争推动历史。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当然存在。但解决不了“社会团结”问题，政治共同体缺乏“竞争力”，会被其他政治共同体吞噬。

春秋“无义战”终结西周的中华“封建大一统”。国家性质类同的“战国”开启中华“郡县大一统”。两千三百多年前，尽管商鞅被处死，商鞅之“法”发扬光大，贫穷落后的秦国国民上下同心，比任何其他大国的“内聚力”更强。他们努力获取先进军事技术，获得相对其他大国的战争优势，从而获得“规模”优势。

此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2、政治共同体与“社会自由”塑造先进政权

西学强调，先进技术/先进生产力促成社会分工结构的变迁，而“社会自由”塑造先进社会，先进社会塑造先进政权。这也是重大理论贡献。时至今日，中国大多数学人对“自由”与“创新”之间密切而现实的关系有切肤之感。但引入“政治共同体”作为“基本分析单元”，我们对“自由”可以有全新的认识。

相关的西学思想可分为左右两大派，或称“激进派”与“温和派”。两派都认为社会阶级集团的“自由”塑造先进政权。区别在于：强调被压迫集团的“自由”，还是各集团进行制度化利益博弈的“自由”。而

今，两者的差异是当代“意识形态”斗争的核心，区分政治的“左”派和“右”派。

激进派假设：先进技术刺激社会分工和社会构成变化；一部分人从事剥削压迫和“统治”，另一部分人被剥削压迫和“被统治”；历史进步来自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阶级斗争”，让被压迫集团战胜压迫集团，就是争取阶级“自由”的斗争。社会自由塑造先进政权，如无产阶级专政。于是，奴隶与奴隶主的阶级斗争，农奴与封建领主的斗争，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都推动社会“自由”。阶级“自由”的覆盖面大小决定社会先进性，先进社会决定先进政治结果。

但是，生产力进步与阶级斗争怎样关联？历史能证明，“奴隶主阶级”阻挠使用青铜器和铁器，或“封建贵族阶级”阻挠使用机器和电力，或“资产阶级”阻挠无形产品的创造？五千年前，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之战以及炎黄联手与蚩尤部落之战，是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春秋无义战”是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的战争？哪个阶级征服了美洲、南亚、非洲？围绕重新瓜分全球殖民地，欧洲连打两次世界大战，世界大战是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的战争？一部西方近代史，是阶级自由的历史还是一部分政治共同体征服其他政治共同体的历史？

温和派假设：先进技术刺激社会分工和社会构成变化；一部分人强调不断扩大生产，另一部分人强调平等分配生产果实；利益集团间博弈的“自由”程度决定社会先进性，先进社会决定先进政治结果。于是，社会分成支持财富公平分配的集团和支持财富制造或创造的集团。双方自由组合利益盟友，为己方争取更多选民，就是“自由”。社会和个人的“自由”导致先进的“自由民主”政权。

但是，生产力进步与制度化的集团“自由”博弈是什么关系？当欧洲早已废除了农奴制，为什么“先进”的美国却倒行逆施、推行残暴的奴隶制？历史能证明，不同阶级的自由博弈刺激科技发展？新中国军事、科技、医疗、教育等事业的快速发展，包括今天中国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惊人发展，是鼓吹“阶级自由博弈”的结果？根据社会/个人的“自由度”给政权分类，再以社会不同组成部分为分析单元，不断拆分社会，对政治结果的解释力日渐显出苍白。

西学知识兴盛，三百年来无数学人贡献的论证似如铁桶般成熟、严密。但是，“以政治共同体为基本分析单元”，结论比“激进”与“温和”两派的解释力强大许多。

(1) 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的阶级“自由”

马克思的史观是：“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他重点阐述资本主义制造业时代的阶级斗争。制造技术把生产力推到顶峰，分配成为最大的问题。社会趋于分化为两大阶级：一方是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资本家阶级，另一方是被剥削的工人阶级。受压迫剥削的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者必然团结一心“剥夺剥夺者”，发动“最后的”阶级斗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从而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未来理想社会将实现每个人的彻底“自由”，从而彻底解决人类根本问题，即财富占有差异随生产力发展而周期性扩大。

马克思没机会看到：制造业并不代表生产力发展的顶点。在无形产品的“创造”时代，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演化为知识创造和知识产权问题；社会日渐分成很多阶层和利益集团，而非“两大阶级”。

马克思没机会看到：工人阶级有祖国。祖国是工人阶级乃至所有阶级和阶层的根本依托。若能活到今天，他会看到：生产力居然也有“国籍”，按政治共同体的名称统计，以政治共同体为单位进行竞争。若能活到今天，他会发现：划分民众福祉的根本界限不是阶级，而是政治共同体的疆界。连城邦国新加坡也不例外。无论政治共同体的“阶级性”，中朝边界是中国和朝鲜两国人民福祉的根本界限；中越边界也是。若能活到今天，他还会发现：在超大型政治共同体的竞争压力下，除俄罗斯外的欧洲正走向联合，联合成一个国家。否则在他眼里的“先进”欧洲，“列强”全会被“开除球籍”。

欧洲最大的政治共同体德国，是马恩在发表《共产党宣言》二十多年后才建立的。围绕这个新兴国家，不是围绕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欧洲人连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问题”延续了一个世纪，到二十世纪末才结束。类似“德国问题”，围绕“中华复兴”而来的“中国问题”也将延续至少一个世纪。显然，是美国要遏制中国，不是美国的哪个阶级要遏制中国的哪个阶级。在二战中，“社会主义”的苏联与“资本主义”的英美共处同一战壕，共同对付“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苏联消灭了私有制和阶级；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同样信奉消灭私有制和阶级。但毛主席在“冷战”高潮中带领中国站入美国战壕里。中国为摧毁苏联做出重大贡献，甚至可说是决定性贡献。延续半个世纪的“冷战”不是因为苏联模式或主义，而是因为苏联拥有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经过世界大战检验的军事实力和武力全球投

射力。如果实验消灭阶级和私有制的国家是北欧小国芬兰，美国会饶有兴趣地观察其成败，不会对芬兰发动世界范围的“冷战”。芬兰模式相当接近苏联模式，但地缘政治却导致芬兰归属西方同盟。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声称，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将归还沙俄抢走的全部中国领土。但革命胜利后，列宁又称，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当然越大越好”，全然推翻了革命前的许诺。这不是“主义”问题，而是现实政治的铁律。孙中山曾在辛亥革命胜利前把满蒙地区空许给日本，幻想换来日本对革命的支持。除非战败或势弱，中国共产党政权同样寸土必争，不会轻易放弃大清或民国“反动”政权获得的国土。

由于三十年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宣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而今的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党奉行的是“中国化”和“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两化之“化”是动词，不是名词。“两化”的“最新成果”，加上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的“最新指导思想”。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2) 关于“自由”的“自由民主”

对比激进派的“自由”史观，对当代世界有更大、更普遍影响力的是温和派的“自由”史观：看重分配的利益集团与看重生产的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制度化的“自由博弈”，即“有法治的民主”，或称“自由民主/社会民主”。当代思想家主要辩论这“民主加法治”的温和思想，企图不断推进其趋于精致。这思想对当代中国影响巨大：中国的治国原则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

强调生产与强调分配的双方，进行“自由”博弈，有三个要点：

第一，双方都尊重个人“隐私”，也就是强调“公权”与“私权”分际，体现西方自“文艺复兴”时代开始，从强调“集体”（团体）自由到强调“个人”自由的明显转变。

第二，双方都警惕官权，要求以“民权”限制“官权”，并实行政权内部的“分权制衡”。民权上升与热兵器和军队构成有关，与制造业的勃兴有关。随之不断发展的是教育事业：从普及初等教育到普及中等乃至高等教育。确认“民权”的制度安排，而今称为“民主”。

第三，双方都为争夺政权的“自由”辩护。“左翼”强调分配平等，“右翼”强调生产扩张；但只要实行政党自由竞选，反映社会利益集团在博弈中变化的政治实力对比，都被视为“合法”政权；反之，则

被称为“缺乏合法性”的政权。

西方“温和派”的上述三要点在当代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更与“激进派”一道推动了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进步，故需严肃讨论之。

第一，个人“隐私权”的背后是“公权”与“私权”的博弈，掩盖了两者在政治共同体意义上的统一。

“自由”思想的根基是“隐私权”。在封建欧洲的乡村，农奴和小型自由农皆依附于土地贵族，思想则由天主教体系垄断，谈不上个人“隐私”。从文艺复兴晚期到大航海时代，欧洲城市“市民阶级”成长壮大，“神权”逐渐衰微；“市民”要求划分“公权”与“私权”，捍卫“个人权利”，从而促成“隐私”概念兴起。“隐私权”具有很大社会吸引力，谁能不在乎“个人隐私”？

然而，“隐私权”的背后是划分“公权”与“私权”的渴望。不直接谈论“公权”与“私权”之分，能显著减少分歧和论证负担。

自有“公权”就一直有划分“公权”与“私权”的努力。由法律规定公权与私权的划分，是显著政治进步。

但是，“法权”并不代表划分本身的成功。历经数百年讨论，我们依然分不出“群己权界”到底在哪里，分不出“公权”与“私权”在理论上的界限。于是风行含糊标准：“多数投票同意”，包括同意在“紧急状态下”停止执行“宪法”。

家庭内的权力貌似标准私权，但夫妻平等和儿童保护却属于公权。性关系是最隐私、最典型的私权。但禁止近亲间生育却是公权的最初标志，原始部落时代就有。而今，即便对不涉生育的性关系，公权禁止任一方强迫，还通过维护公共禁忌来维持政治共同体。枪是用来杀人的；但美国宪法规定私人拥有枪支是“个人权利”。事实上，今日西方连“性别区分”也成了“公权”讨论的范畴。很多经济学人珍视“私有财产权”。但看看政权的“土地用途管理”和不断增长的“所得税”，就知道“公权”与“私权”间不可能有清晰的理论界限。

为什么“公权”与“私权”不可能有清晰的理论界限？因为**政治共同体间的生存竞争远高于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斗争。**

美国建国之初剥夺“保皇党人”财产，在他们身上涂柏油、插上标志印第安人的羽毛加以侮辱，把他们驱逐到英属加拿大。所以《美国独立宣言》没提“私有财产权”，而提“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人以武力“开疆拓土”和拓展美国“势力范围”，就是（美国人）“追求幸福的权利”。中国共产党原本奉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何

以不久后变成“减租减息”，实行“统一战线”？那是因为需要与国民党联手抗日。这种变化长期被称为“民族斗争超越阶级斗争”。但为什么民族斗争会“超越”阶级斗争？危机时代、战争时期，一切私产皆可被公家“征用”，因为“覆巢之下无完卵”。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生存竞争塑造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公权”与“私权”关系，而且高于“公权”与“私权”两分。

中国史能启发对“隐私权”的新认识。不同于强调“团体”或“个人”，中国强调“家庭”，即血缘互助。家庭不是集体，也不是个人；却既承认集体，也承认个人。从小家的育小养老，到大家的育小养老互助，到全国范围的育小养老互助，所有中国人都以血缘称呼彼此。“家国”或“国家”，指向对大型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对“大一统”的有机（血缘）认同。与“隐私权”一样，“家庭”也避开了“公权”与“私权”两分。但由小家而大家、大家而国家，“家庭”天然强调民众在大型政治共同体里“搭帮过日子”的意义，即“大一统”的意义。

第二，要求以民权限制官权，政权内部实行分权制衡，掩盖了两者在捍卫政治共同体意义上的一致性。

提升民权、限制官权，对中国知识而言意义特别重大。传统中国奉行“民营私、官奉公”，实践“官权至上”迄今已有两千多年。“学而优则仕”，不入仕就不算“人才”。哪怕科技人才，欲被承认为“人才”，就要先争相入仕，成为科层体系的“中层干部”，由各级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封衔。“人才”与“圣人”标准不同。在制造业和创造业时代，政治共同体的兴旺取决于“自古英雄出少年”和“遍地英雄下夕烟”。官权至上是农耕时代的价值观，早已落后于时代。换言之，中华传统学问强调大一统，却短于分析在新生产方式条件下大一统“内聚力”的新办法，即政治扁平化，或称“人民主权”。特别自“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群众路线”被过度的“精英主义”史观淹没。由此，中国政学两界的主流，批评美国大众政治的分裂性，却忽略美国大众政治的凝聚性，特殊的内聚力。

然而，刻意设置官权与民权的两分和升降对立，掩盖了政治共同体的实质，实质是土地、国民、政权的“三位一体”。要保持社会秩序，就要以“祀”来维护官民团结。何为“祀”？中东的酋长们聚集巨大家族财富，但死时与平民一样以一袭白布包裹尸体埋入沙土；生前每年要与平民一起过一个月的“斋月”，遵守“斋月”规定。在“上帝”或“真主”面前人人平等，现代政治共同体才有“内聚力”。

“内聚力”概念回避价值判断。缺少“祀”，缺少礼乐制度，常被称为“野蛮”或“不文明”。但用热兵器乃至机枪大炮原子弹杀人，比用冷兵器乃至棍棒杀人更“文明”？“主义”高下之分或“文明”与“野蛮”之分，不过是价值判断而已。

“内聚力”的要义是官民“上下同心”。官权内部的“分权制衡”，并非提升民权、提升内聚力的唯一途径，而是一种地方历史条件导致的地方历史传统。而今，各国普遍实行制度上的“分权制衡”，但多数并不被承认为“民主”。显然，不是政府权力越分散、越有利于国民福祉。中国不实行“分权制衡”，而推行古老的“分工制衡”，即“分工不分权”。“党的群众路线”，以基层重于科层（以下为上）、以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小事为大事（以小为大），一旦成为政治原则，也可以导致“人民当家作主”，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内聚力”从哪里来？缺少“外部”压力就谈不上“内聚力”。没有“敌国外患”，也不会有“法家拂士”。因为缺少外部压力，南太平洋岛屿社会和遭遇欧洲人之前的美洲印第安社会，“祀”的手段停滞不前，没有也不会发生“内聚力”手段的进化。

我们承认官民间的矛盾。但也必须看到官民在政治共同体中的“整体性/一致性”。整体性来自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生存竞争压力。通向“民主”的途径很多。失去“上下同心”这一本质要求，就很难避免政治共同体的落后乃至衰败。

第三，社会集团争夺政权的“自由”，倾向削弱政治共同体内聚力。

西式政治要求通过个人结社自由、进而组党，以定期全民选举让利益集团自由博弈、争夺政权，从而准确反映社会构成的变化。

在阶级分际清晰的社会，定期的政权竞选能反映社会势力对比。然而，阶级分际不清晰、不稳定，却是三千年中国社会的突出特征。在中华社会，政权的“持中”和“平民性”被广泛珍视。中华习惯于宣扬“致中和”，质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相信“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阶级分际不清晰、不稳定，不仅是中国社会特征，也是当代美国社会的特征，还代表“现代”生产方式和“现代”教育事业导致的世界发展趋向。可以说，中国特例并不特殊，具有“普世”性。

我国政学两界广泛关注西式“政党政治”，关注其在压抑官权、提升民权方面的积极作用。中国学界普遍认为：定期举行政党竞选是

打破欧式阶级政治垄断的有效途径，具有显著的历史进步性。而且，“民主选举”早已是官宣“中国民主”的正式组成部分，只是不包括政治上的自由结社结党。我国学人既看到竞争型“政党政治”的优点，也理解自己国家因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而不能从西方简单“抄作业”。

毋庸讳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功，与排斥政治上的结社结党有关，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关。继承中华“同心圆”政治传统，“党的领导”协调各方，是中华政治共同体大团结和团结向前的根本力量。事实上，传统中国的“大一统”也由思想统一的“儒门弟子集团”主导，同样拒绝鼓吹“阶级斗争”。

所有人都能看到：因为鼓吹阶级斗争，“大选”往往是西方政治共同体相对最脆弱的时候。中国不少“右翼”学人崇尚西方，强调个人自由、蔑视政治共同体的自由，却也为越来越为办不成大事的西式“否决政治”（veto-cracy）感到困扰、困惑。

“左翼”与“右翼”政党通过定期选举争夺政权，导致社会团结还是社会分裂，倾向强化分裂还是强化团结？答案很难一概而论：成本收益之比与该国的历史条件塑造的不同竞选制度设定有关。同样的制度安排，由于不同政治共同体的不同历史条件，收益成本之比也不同。

在多数中小型政治共同体，“左、右”之争其实是在大型政治共同体夹缝中的生存选择，或者说是被大国塑造的选择。乌克兰可以选择依附欧盟/北约，也可以选择依附俄罗斯，更可以像芬兰那样选择中立。新加坡的选择也一样。所谓“正确”或“错误”选择，只能以生存结果论。

在大多数非西方社会，政党经常是“前阶级”的代表，代表部落、地方豪强、宗教势力、方言群体，等等。显而易见，那里的定期选举大多导致政权腐败和社会脆弱分裂。

西式政党制度并非雷同。若以欧式“政党制度”为标准，美国没有“政党”。美国的两党没有党员、党纲、党纪，没有党的科层和基层扁平体系。“党员”仅是竞选前夕“选民登记”的选项。代表政党选举总统的候选人，还可能“跳党竞选”。原为民主党人的特朗普，一夜间转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美国的政党其实只是“竞选平台”，大体分为倾向“精英”或倾向“平民”两个平台。五花八门的利益集团在平台上讨价还价，达成分配公共资源的交易。两大平台各自代表“平民”

还是“精英”？那随时事反转，眼下正在再次反转过程中：民主党开始回归倾向精英的传统，共和党开始回归倾向平民的传统。美国移民社会有相当高的社会流动性。南非青年马斯克，仅在加拿大获得本科学历，却在美国大放异彩，成为世界级科技领军人物。在美国各行各业，无论文科理科工科，类似的事很寻常。

美国社会全部由不到四百年外的外国移民构成。迄今美国政府每年固定向世界各地派发100万张移民“绿卡”，美国移民来自世界每个角落。自建国之始直到今日，美国社会一直相当分裂，盛行各种极端主义思想，乃至一切政策都被激烈争论到极端。而且美国还为本国的言论和结社自由非常自豪。美国联邦制赋予各州很大的立法和执法权。从开国延续至今的美国“种族矛盾”，更是看不到彻底解决希望。种族差异不仅是语言文化差异，还是显著的黑白黄肤色差异。美国还允许私人持枪，超市出售枪支弹药，普通家庭普遍拥有枪支弹药。美国越来越盛行“否决政治”（veto-crazy），“大事”越来越难办。大选时美国社会团结更显得非常脆弱。

全世界都感到惊奇：如此美国，社会怎么可能“稳定”？

缺少“敌国外患”，美国很难支持强大“内聚力”。从13个大西洋西岸的英国小型殖民地，到“三洋大国”，到势力范围涵盖整个南北美洲并涉足欧亚大陆，美国仅用了一个世纪，比先前俄国在欧亚大陆上的扩张速度快得多。在紧接着的20世纪，美国更确立了全球霸权。

看不到美国强大的“内聚力”是盲目的。对比极具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各级“政治协商会议”给各方“代表人士”发准官帽和参议权，美国以异常的差异宽容性和强烈的对外侵略性，获得了貌似不可能的强大“内聚力”。相对母国，移民们对美利坚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度非常高，各方势力团结对外，例如眼下反华。美国国民普遍不认同少数外国人给美国贴的“阶级统治”标签，遑论“华尔街统治”标签。

以政治共同体为基本分析单元，“民主”在本质上是“祀”，是政治共同体“内聚力”的方法。官权需要被约束，但社会团结却是政治共同体生存的必要条件。强调社会团结，指向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团结互助，指向“内聚力”。

概言之，社会与政权两分，强调社会的决定性作用，对政治知识贡献重大，却也缺陷明显，即难以有效解释“nation”及其进化，也难以解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演化。政治共同体的生存竞争，而非

社会分裂，塑造社会和社会观念变迁。

3、政治共同体与先进政权形态的持久稳定

“先进”的政权形态能持久稳定？很多人相信，“自由民主”是迄今已知的最先进制度，没有“更好”。所以，政权形态的历史可能已经终结。对现代西方而言，定期全民选举政府领导人，保障“民主”政权，具有不可替代的先进性，能让政权长治久安。

谈到政权兴亡循环问题，毛主席曾对黄炎培先生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民主政治的道理并不复杂。硬支配权决定政权存在，软支配权决定政权持久。一旦垄断了税收和暴力，靠利诱和暴力去支配他人是致命诱惑，比靠耐心说服和保持支配者的人格便利得多。掌权者执政日久，会被没有政权却有思想和人格的人取代。对此，经济学人称为“交易成本”问题；政治学人称为“人性”问题。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是“人性”。政治学与经济学不同，政治学不以假设“理性人”为学科前提。五花八门的精神观念从来都是政治研究的重要变量。

换言之，不让少数人专断一切的“民主”，与政权稳定性相关，是有效、出色的政治知识。

“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让人人起来负责”，是“民主”道理。但这道理并没指出具体路径。道理很重要，但道路千万条。先要信“民主”道理，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各地条件不同，未必要遵奉“政党竞争型选举”为通向“民主”的唯一道路。中国共产党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分工不分权，于是中国民主只能依赖“党的群众路线”，依赖“党的群众路线”与时俱进，依赖“全过程人民民主”。

但政治学不能神化“民主”，乃至认为民主政权永恒。长寿之道是科学，长生不老是迷信。地球、太阳、宇宙也不能永恒存在。政治共同体当然不会永恒，何况政治共同体的政权。中国人没有单一神信仰，但与柏拉图一样，两千五百年来信仰没有私有制的“天下大同”。

对实际的政治运作而言，并非“民主”程度越高越好。“民主”的至高程度是“全民公决”所有重大事项。无论国家大小、国民多少，在技术上很容易做到所有重大事项的“全民公决”。所有公民携带电子投票器，每天定时公决两项国家大事，每年能决定七百多件重大国事，而且即时出结果。但决策错误谁负责？答案是：没人负责；所

有人负责等于没人负责。因此，实行“代议制”，直接或间接推选出极少数负责人，定期更替责任人，是普遍和现实的“民主”实践。“代议制”与传统的“贵族制”其实异曲同工。

什么是“决策错误”？决策错误为什么重要？因为决策的结果关乎政治共同体的兴衰续绝。

外来政治共同体的军事压力是政权兴亡的最重要原因。民主长久保障政权的判断明显缺乏历史支撑。跳出“社会与政权”两分，历史叙事明显不同。

政治共同体的生死存亡并不取决于政权本身的“先进性”或“阶级性”。“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战争胜负与政权的“先进性”没有必然关系。英国海盗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靠的是“先进”海军技术，即海盗小船灵活快速和火力凶猛，再加上偶然的“运气”。打赢了，英国海盗就变成“无敌”的英国“皇家海军”。

由于斯巴达城邦与雅典城邦长期的惨烈战争，落后无名的马其顿城邦忽然崛起，终结城邦时代，开启封建王国时代。罗马共和城邦原本不过是个强盗窝子，外出抢劫奴隶和财产是那里几乎所有成年男子的职业。但通过战争和占领，罗马城邦制度不断进化，建立了与汉朝同期的“大一统”，即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寿命比汉朝还略久，奠定了西方历史文明基础，正如秦汉奠定了中国历史文明基础。罗马帝国被各日耳曼“野蛮部落”摧毁，开启了欧洲漫长的“封建”时代。希腊“民主”政权消失了，罗马“民主”政权也消失了，被“不民主”的政权取代。汉朝被“五胡”摧毁，宋朝被“蒙古”摧毁，明朝被“满清”摧毁。“野蛮”摧毁“文明”，是政治共同体史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华大一统号称三千年，其实一半时间是分裂的。中华政治共同体的特色不仅在“合久必分”，更在“分久必合”。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今所有国家都花巨大代价保有本国军队。新加坡仅是个城邦，也拥有自己的军队，而且实力还颇可观。小国强军能让入侵者“得不偿失”，也能降低保护国的保护成本。欧盟尚不够“政治共同体”资格，因为“欧盟”成员国各有自己的军队而“欧盟”没有军队。“联合国”里个别小国养警察不养军队；但这类国家数量极少，而且都是大国的“附属国”，比如法国境内的摩纳哥。

政权性质和形式的演化、进化，的确是重大课题。然而，政权性质和形式为什么会演化？答案是：政治共同体之间生存发展的竞争。“法家拂士”与“敌国外患”其实是一体两面，各种政治共同体的模

式经生存竞争而发生“社会化”（socialization）。观念，无论基督教观念还是民主观念，不过是政治共同体竞争史的一部分。

被当代政治学忽略的基本道理是：政治共同体是国土、国民、政权的“三位一体”。政权只是政治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忽略“国土”，只讨论政权性质和形式的“国家理论”，无论强调“社会”或“政权”，都是苍白的。

上述道理并非“内因”与“外因”的关系。中国三代人熟悉和认同毛主席在《矛盾论》里写下的判断：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所以内因是主要原因，外因是次要原因。毛主席据此批判王明之类：鸡只能下鸡蛋，不可能下石头；俄国下“十月革命”的蛋，中国下“中国革命”的蛋；十月革命只是中国革命的外因。他的判断看上去毫无问题。

然而，“内因”来自哪里？若发现内因与外因之分是相对和含糊的，甚至内因来自外因，那么哪个是“决定”因素？两分法的最大问题是两者间“互为因果”的循环论证。

《道德经》讲“三生三、三生万物”，颇有启发性。“三”是“两分”之外的新概念。找到“三”，才是解释“万物”的关键。“三”或能带领我们回到“一生二”的“一”，新的“一”。

“竞争”创造“无序”压力；“有序”在“无序”压力下形成。社会演化的动力不是“内因”、也不是“外因”，而是“三”，是“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生存竞争”。政治共同体在竞争中生存发展，彼此交流、取长补短，甚至因成败胜负而交融为一体。为什么竞争？因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无处不在，即政治共同体间的“无政府”压力。

社会类别到底是政权类别的原因还是结果？“无解”是社会与政权“两分”本身导致的。跳出这“两分”，才可能获得新知。

本文旨在说明：政治共同体间的生存竞争，是一切政治结果的原因，包括国民分化或团结，包括政权类型分化或同化。以这简约的单一原因解释政治，可称为“三”，也可称为新的“一”。

以政治共同体为政治分析的基本单元，政治共同体间的生存竞争塑造出五千年人类社会演化史的主线索：原始部落聚合为城邦、大小城邦聚合为领地、封建领地聚合为国家、中小国家聚合为大国甚至超大型国家。一切实用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一切社会变迁和观念的演化、一切政治设施和法律体系的进化，都可由这历史主线索解释。

概言之，政治共同体政权的持久性，并不取决于政治共同体政权的“先进性”或“性质”，而取决于政治共同体“竞争力”的大小。从这个视角看，政治共同体的“性质”没什么根本的不同。

四、“以政治共同体为基本分析单元”的史观

本节的目标只有一个：表述“以政治共同体为基本分析单元”的政治学理论/假设。

在第二节第三目，本文讨论了社科理论的构成。社科基础理论由极简约的三部分组成：（1）基础概念间的因果关系；（2）因果关系成立的前提条件；（3）因果关系的发生机制。

“以政治共同体为基本分析单元”的理论由三部分构成：（1）基础概念定义及概念功能构成的前提条件；（2）基础概念间的因果关系；（3）三要素构成的因果发生机制。

“新史观”的简约表述即下述三部分标题之合。

1、概念定义和前提条件

“政治共同体”是在一定地缘范围内、有统一政权领导、国民“一起搭帮过日子”的群体。“搭帮过日子”指群体的三项基本功能：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国防安全）。

缺少地缘、国民、政权中的任何一项，都不是“政治共同体”。旧史观强调国民与政权，忽略国土。新史观强调国民和政权生活在有强硬地缘界限的国土上，强调“地缘政治”驱动生存竞争。梵蒂冈几乎没有行政地域，算不上政治共同体。没有“国土”的“犹太民族”是语言文化共同体，甚至仅是宗教共同体。

政治共同体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政治共同体的产生基于物质生产方式飞跃这个基本的物质前提。七千年前人类有了“产业”，开始定居。经过漫长定居史，“城邦”在距今五千年上下出现，开启了政治共同体历史。至今我们依然能见到如新加坡那样的“城邦”。政治共同体不能解释“城邦”前的原始部落时代，那时还没有“政治”。

城邦出现，是构建政治共同体理论的纵向历史的“前提条件”。政治共同体理论成立的主要“前提条件”则是横向的，即“政治共同体”拥有的三大基本功能。政治共同体理论的“前提条件”，实指政治共同体的三大“基本功能”。

所有政治共同体都基于“非政治共同体”，即“生活共同体”。古今中外，所有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功能皆为“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缺少三项功能中的任何一项，政治共同体都无力持续生存。

三项基本功能表明：政治共同体天然具有“社会主义”倾向。

第一，“扶老携幼”事关成员的延续生存，是共同体生存的原因和

目的。五千年来，随着政治共同体趋少、趋大，医疗和教育事业渐成政治共同体公共支出的最大部分。所谓“社会建设”开支，其实也主要是扶老携幼。没老没少的社会是“宿舍”，不是任何群体的“家”。

第二，“扶危济困”是共同体存在的道义前提。各家自顾，连应对兽类都难，遑论应对人类群体。在原始部落时代，遗弃老弱病残是普遍现象。市场时代之“困”，主要指“贫困”。而今各国竞相在“扶危济困”方面做得比别国更出色，是为国家形象/吸引力最扎实的要素。

第三，成员“守望相助”才能获得群体的“安全”，即国防。无需枪杆子就无需政权；有枪杆子才有政权。“政治”共同体不同于“前政治”的生活共同体，“国防”是建立“政权”，形成“政治”共同体的根本原因。“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从西文看，城邦就是政治，政治就是城邦；但政治也是警力，警力就是政治。远至近三千年前，《民劳》表达了民众对“国无有残”的渴望。美国立国的经典文献《联邦党人文集》，鼓吹13个大小政治共同体联合而成“联邦”，主要理由是“集体安全”，彼此间和平不打仗，联合“对外”，获得政治共同体的“规模”，获得“地缘政治”优势。

扶老携幼和扶危济困是政治共同体“认同”的基础，更构成“守望相助”的基础，即有效“国防”的基础。

当代有个重大误解：美国在扶老携幼和扶危济困方面做得很差。那并非事实。缺少扶老携幼和扶危济困的互助，远道而来的定居殖民者活不下去。美式“社会主义”是美式“资本主义”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强大的社区互助认同也是美国严重种族冲突的显著原因。

2、因果理论

政治共同体间的生存竞争及由竞争而来的相互交流和彼此促进，推动了一切实用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一切社会和社会观念的变迁，一切语言和宗教文化的演化、一切政治设施和法律体系的进

化，从而塑造出五千年来的社会演化史的主线索，并可由这主线索予以解释。这条主线索是：部落聚合为城邦、城邦聚合为领地、封建领地聚合为国家、中小国家聚合为大型甚至超大型国家。

我们而今相当熟悉世界各地技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各地社会分化和社会观念的变迁史，各地语言和宗教文化的演化史，还有法律和政治设施的进化史。我们甚至还看到政治共同体的“趋同”。问题不在于我们不熟悉各地的历史，而在如何解释世界各地的历史。

自近代以来，拆分社会和政权是个有效的分析方法，大有助于记录和书写世界各地的历史。但在今天，更细致地拆分社会和政权，不再能帮助我们有效地解释历史。

“火药”不是“枪粉”。先有枪，后有动力机器。没有政治共同体就没有“十诫”成为“法律”而普及。无论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或儒家思想，无论罗马帝国还是东罗马帝国，无论阿拉伯帝国还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切语言宗教、法律体系、政治设施，都由政治共同体的生存竞争而来，因政治共同体的生存竞争而演化。

不是因为种种“新大陆”的“新”才有美国。先有驱逐英国军队建立新国家，后有“新大陆”的种种“新”。美国的建立，不是因为阶级斗争或与英国的语言宗教文化差异，更不是因为“无代表，不交税”。英国军力优势在海军，难以控制人口暴涨的殖民地，更难阻止宿敌法国挑动和帮助美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在18世纪晚期，大西洋彼岸的13个英属殖民地，出现了建立独立政治共同体的机会。

中国效法苏联废除市场机制实行计划经济，又以苏联为敌，重新引入市场机制，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这不是“内因、外因”的关系，而是中国的生存发展机会，是“球籍”问题，是政治共同体之间生存发展竞争的结果。

政治共同体间的生存竞争，带来彼此的交流和进步，带来驱使政治共同体彼此类同的“社会化”，带来政治共同体的兴亡、进退、分合，带来规模更大、内聚力更紧，生产力更高的政治共同体。

这是新史观，重新解释上下五千年的人类社会文明的史观。

政治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是什么关系？生存需求决定发展需求。政治共同体的生存安全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相对的“富强”密切相关。但一方的相对“富强”也给另一方带来相对的生存“不安全”。换言之，为生存而发展，因发展而引发更激烈的国家安全竞争。到2020年为止的1/4个世纪里，中国在钢铁、发电、交通、通讯等领域从远

落后于美国到超越美国，甚至远超美国。中国人均GDP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经济总量逼近美国，更令人瞩目。忽略那些数据，忽略急剧“结构”变化的国际关系学者，至今还为中美关系急转直下而困惑，就相当不专业。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中国快速增长的军费和惊人的军事技术进步是为了自卫。但中国在美国军力面前有“自卫”能力，当然意味着美国全球霸权的终结。美国军费开支占世界总军费开支一半。只有中国具有轻松赶上美国军费开支的经济规模。在军事领域，当仅有美苏两国拥有核武器，美国学者约翰·赫兹（John H. Herz）构建出解释力强大的“安全悖论”：甲方越安全、乙方就越不安全。德国的“富强”引发欧洲不安，中国的“富强”引发美国不安。

“安全悖论”指的不是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矛盾，而是地缘政治矛盾，包括“势力范围”（国土疆界外延）的矛盾。“安全悖论”与富强相关，“强”与规模相关。“富而不强”的小国不会引发“安全悖论”。

不仅“热战”，哪怕“冷战”，失败的结果也极其悲惨。前苏联国土上的经济凋敝和人口及人均寿命的急剧下降，是摆在一代人面前的事实。生活在“代理人战争”阴影里的人们，更懂得战争离人类从未更远，离欧洲也不远。若今日超大型政治共同体之间发生“热战”，将比二战惨烈得多。只要人类划分为政治共同体，有硬国土疆界区分人类群体和群体福祉，战争就难以避免。

世界和平由战争的恐怖和先进武器的平衡维系，不由“主义”维系。“国之大事”迄今依然只有两种：“祀”和“戎”。“戎”塑造“祀”。

一方面，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人类的“相互依存”明显是事实。产品、信息、气候、能源、原料、健康，似乎都在“全球化”，超越“政治共同体”的自利和自保。于是，中国率先向全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号召。

另一方面，“相互依存”的利益不敌“霸权”和“反霸权”的利益。在20世纪前半期，“国际法”只是战前的遮羞布。在“冷战”时期，全球体育盛会也是操弄地缘对抗的领域。而今，我们再次看到国际体育盛会被地缘政治操弄，俄罗斯的出色文化作品在西方也“被下架”。气候变迁乃至延续三年的新冠病毒威胁，非但没有促进美中合作，反而激化对抗。病毒重新确立原本已虚化的欧盟内部国界；俄乌战争还在瞬间撕掉“气变”的华丽包装。百年来，军事技术一直引领民用技术，迭代性质的武器和情报手段加速进步。军备竞赛从地面走上天空，从天空走向太空。“人工智能”武器加入“常规武器”行列，让战争

从恐怖变得更恐怖。原本以“确保共同毁灭”（MAD）来保障和平的核武器——不能使用的“绝对武器”，正变成微型化、卫星制导、能以十倍以上音速飞行的“战术核武器”，变成“常规武器”。人们当然懂得，使用“战术”核武器必然导致战争“升级”，升级到使用“战略”核武器。尽管如此，自美国在南斯拉夫使用“贫铀炸弹”，核门槛一直在被侵蚀，被发明核武器的美国侵蚀。

制造和获取先进武器是极致“理性”的结果，也必然导致“疯狂”。有学人声称本国“理性”而别国的同样努力“不理性”；那不过是在充当霸主战争机器的一个零配件。

武器加速进步与政治共同体规模趋大密切相关。没几国能支付得起“航空母舰”和“太空星链”的巨大成本。规模超大的政治共同体已经笼罩全球政治舞台。

政治共同体间的生存竞争导致政治共同体趋大。三千年前的西周政权，在狭小的“中原”实行“封建”，名义上“管辖”多达上千个政治共同体。而今全球人口向百亿膨胀，政治共同体却仅剩两百来个，起明显作用的不超三十个，起主导作用的更是个位数。

全球被几个大型政治共同体笼罩，先进的内聚力手段不断“社会化”，驱动“趋同”，如“战国”时七大国的“性质”因类似的“变法”而趋同。若坚持拆分政权与社会的旧方法，就会做出秦国社会政治构成比楚国社会政治构成“先进”的判断。但是，如何解释秦皇身后仅十多年，楚国人推翻秦朝建立了辉煌的西汉王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让秦楚“社会性质”截然不同的判断显得苍白。

政治共同体规模趋大、“性质”趋同，指向了依稀可见、却遥远难及的“天下大同”。

3、因果发生机制

“竞争力”塑造竞争结果，体现竞争的“机制”。三要素的合力及张力构成“竞争力”：（1）相对的国土和国民“规模”；（2）相对的精英与平民间的“内聚力”；（3）相对的人均“生产力”。

为什么“结盟”不属于“机制要素”？

没人会忽略大小政治共同体间的“结盟”行为；弱势国家必然联合起来对抗强权。但国家也必然自私、自保；结盟从来不是长期稳定的因素。有“合纵”就必有“连横”。六国的“连横”不断变化，未能匹敌秦国的“合纵”。台湾岛内信奉什么并不重要，这个岛屿向来是美国对华交易的砝码。在21世纪开端，美国全球霸权如日中天，想打谁

打谁，其他大国噤若寒蝉。二十年后美国在中东失利，只能结束“单边主义”，联合日本澳洲欧洲一道遏制中国崛起。无论“合纵”还是“连横”，关键在“领袖国”竞争力的相对强大，愿意并有能力支付领导联盟的成本代价。

政治共同体竞争的发生机制可以表述为如下四条。

(1) “规模”，指国土面积和国民人口之综合。政治共同体相对的“规模”，导致地缘政治，是塑造竞争力的第一要素。

国民与政权在国土上生存。政治共同体存在于与他国交界的“一定地缘范围内”，直指“地缘政治”对政治共同体生存的根本意义。

自城邦时代以来，政治共同体的疆界是区分人类群体的基本界限，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界限。忽略或模糊国土疆界，政治共同体死无葬身之地。

“势力范围”是国土的弹性延伸，也是地缘政治概念。在和平时期，“势力范围”是政治共同体之间的主要角斗场。与政治共同体的“硬”国界不同，“势力范围”的争夺总在进退间，疆界弹性很高。

三千年来，中国一直是地球上的第一大政治共同体。“规模”长存，是中华共同体韧性的主因之一。中国人口即将与印度持平甚至略少，但印度国土面积不及中国的三分之一。美国与中国国土面积相当——若算上加拿大，美国面积为中国面积之倍；但美国人口不及中国的四分之一。俄罗斯国土面积比苏联小很多，却依然为中美两国之合，但人口仅相当于日本，约为美国人口的一半和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但中国国土规模有地缘封闭缺陷。较之“三洋大国”，中国仅拥有太平洋沿岸，是“一洋大国”。

尽管国家“寸土必争”，拼尽全力捍卫国土，国土面积依然经常变更，“势力范围”界限更变动不居。竞争成功，政治共同体规模变大；竞争失败，规模变小，甚至政治共同体消亡。就在我们眼前，南斯拉夫分裂成很多国家，苏联分裂成很多国家，非洲国家数量还在增加，“欧盟”却合并了很多国家。战争的胜负，包括热战和冷战的胜负，是国界形成和变更的主因。近三百年来，“国土”疆界剧烈变动。中国的情况也未见乐观。仅百年就丢失了300万平方公里（满清150万，民国150万），还丧失了通往日本海的出海口，以至现存国土面积不足1000万平方公里，甚至眼下也还未完成国家统一。作者的硕士导师陈翰笙，读中学时见证了苏联诞生，头脑还清晰时又见证了苏联崩溃。一个世界“唯二”的超级大国，寿数不及人

寿。“国家安全”好比空气，存在于不知不觉中，却1分钟也不能短缺。

由于“无政府”压力，竞争趋于激化，政治共同体规模趋大。近代以来，政治共同体规模增大的速度加快，堪比从“春秋”向“战国”的过渡。吴越称霸之战震动中原，但越国霸权仅维持不到半个世纪就让位于规模更大的国，即战国的国。越国被楚国灭国时悄无声息。15世纪末出现内陆小国“莫斯科公国”，两个多世纪后变成北冰洋、太平洋、大西洋“三洋大国”。17世纪初，德川幕府实现了日本列岛的“大一统”，但一直局限在岛上，成为“三洋”大国的梦想而今已告破灭。18世纪末出现美国，仅用一个多世纪就变成世界上“惟二”的三洋大国，比俄国扩张速度快得多。17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出现“nation”，却在19世纪晚期才出现欧洲最大政治共同体德国。在20世纪前半期，欧洲诸国围绕新兴德国连打两次世界大战。二战后，传统的“欧洲列强”与“世界格局”再无干系，从而有了包含近5亿人口的“欧盟”，向“超级大国”挣扎前行。与孤独的日本列岛不同，英伦列岛与北欧和欧陆频繁互动，时常“占领”和“被占领”，塑造了英国的混合文化基因。大英帝国的规模曾庞大到号称“日不落”，而今却小到连保有苏格兰都成了问题。夹在美国和欧盟中间，与美国还是欧盟一起前行，是英国的两难选择。

就国土而言，加拿大也是三洋大国，但人口仅相当于中国台湾省。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加拿大附属于英国，总督由英王任命。英国衰落，加拿大渐成美国事实上的附属国。何以证明“附属”？相对美国军队而言，加拿大军队仅具象征性。美加两国边界已然虚化，人员自由往来并可在彼此国家工作。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受美国政府控制。2018年12月1日-2021年9月25日，加拿大边境管理当局接受美国情报机关指令，扣押中国华为公司女继承人孟晚舟近三年，最后由美中两国政府谈判解决。

大国时代的小国作用如何？大国之间需要“缓冲地带”。大国之间存在小国，是大国间张力的结果。没有缓冲地带，大国会直接碰撞。明朝建立时中俄还远隔万里；两国领土交界在清初时才发生，却是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地缘政治大事。中国学人特别理解“缓冲地带”的作用，津津乐道于“七大国”间的“小国”。近两千七百年前，晋

献公“假虞灭虢”，致使“虞国”和“虢国”至今留名。“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战国时燕、赵间的“中山国”至今还是中国热门话题。朝鲜战争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战，而且是大国争夺“缓冲地带”的战争。

国家间的关系与地缘政治密切相关，与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几乎无关。意识形态和文化矛盾，是政治共同体矛盾的结果，而不是政治共同体矛盾的原因。在现实中，两者交织、“互为因果”。但在理论上，“互为因果”误导认知，知识在死循环中无法进步。中美两国曾有长期“蜜月”，因为要联手对付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敌国的敌国就是盟友。跨大西洋两岸持续结盟，因为西欧处于美苏（俄）之间，一直遭到苏（俄）扩张威胁。在美国崛起为世界霸主之前，几乎贯穿整个19世纪，美国与文化异质的法国结盟，主要敌国是文化同质的英国。美国在中东的结盟对象经常是穿白长袍、头戴黑箍的“传统”酋长，对付的却是穿西服打领带、定期举办议会选举的“近现代”国家。越南由共产党领导，但中国与柬埔寨王国的关系比与越南亲近。中越之间1979-89的“边境战争”持续长达十年。

(2) “内聚力”，指共同体内“精英”与“平民”间的团结力。政治共同体间相对的“内聚力”，是塑造竞争力的第二要素。

为什么“内聚力”指的是“精英”与“平民”间的团结力，而非政治共同体内“精英”间的分裂与团结？这个普遍设问，标志“精英主义”在中国学界之盛行已经伤及到“精英”层的历史认知力。

人类社会的最根本区别是“性别”；但性别“相互依存”也最为明显和扎实。政治上的“男权社会”与“女权社会”不同，“性别平等”是现代社会主流。

仅次于“性别之分”的是“精英与平民之分”。在社会地位流动性比以往强得多的“现代”世界，回归更根本的“精英与平民之分”，可以涵盖“阶级之分”，抽象度比“阶级”高，实用价值也更高。

近代以来流行“人民史观”，比以往流行的“精英史观”或“贵族史观”解释力强大得多。欧式“阶级”理论对欧洲旧社会的解释力很强；却未必能解释中国和美国的过去和现在，也未必能解释现在的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中国早有“人民史观”。“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是“人

民史观”；反之，则是“精英史观”。《中庸》称，“子曰：道不远人；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孔子提醒我们：不要去追求离开人民现实生活诉求的“真理”。

没有“保民官”的罗马贵族政治，只是空中楼阁。从西周开始，中华政治“道统”强调政治共同体的生存系于“民”和“民心”。当代精英主义者自作聪明，蔑视中国“民本”传统，蔑视“民”判断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和正当性，甚至以为监控摄像头的虚拟“笼子”就足以“维稳”。依照“精英史观”，明朝毁于上层社会分裂。但事实上，平民冷对无论哪派的大明上层，没哪派获得广大平民支持。而仅二十万户的满清，上下同心，故能一举击溃广土众民的大明。“精英史观”把苏联崩溃解释为苏联精英集团对“真理”的背叛或认知分裂。但“人民史观”承认广大苏共党员和民众有能力比较自己对手国家的大众生活方式，不再支持苏联上层及其《真理报》垄断“真理”。

就政治共同体而言，“精英”与“平民”的矛盾是一对魔鬼悖论。“个人智慧”与“群体痛苦”的悖论如同魔鬼，永恒困扰所有政治共同体。这是关于政治共同体“内聚力”的理解。

若拒绝彰显“个人智慧”，社会就平等，大多数人不会感到痛苦，但代价是政治共同体的整体平庸。若对个人智慧报以对他人的支配权，即财富权、行政权、思想权，就会产生追求支配权的精英集团，代价是“群体痛苦”，广大平民会感到相对被剥夺、被支配。于是，强调平等团结，政治共同体可能因“群体愚蠢”而被对手击败；而鼓励个人私欲，政治共同体可能因“群体分裂”而被对手击败。

根据自身所处的历史和地理条件，各政治共同体总在挖空心思保障“内聚力”，想方设法保持精英与平民的相对利益平衡。中华号称“礼乐之邦”，“礼”固化差异，“乐”濡化平等。不考虑内聚力，大力弘扬内部的阶级斗争，没有任何国家能在生存竞争中稳定、长存。

拆分社会和政权，就要规定“先进”社会和“先进”政权的标准，从而有了价值目的论，追求非历史的、绝对的、普世永恒的“正义”。以政治共同体为基本分析单元，则只有政治共同体“内聚力”的不同办法。“中华同心圆”是保持内聚力的中国办法；“选举民主”是保持内聚力的西式办法。由政治共同体生存竞争而来的“内聚力”需求，可以解释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异同。因此，在哲学意义上讨论绝对和永恒的“正义”，来自“法律人”被单一神“真理”信仰洗脑，并不催生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相对论”知识。

由于政治共同体“内聚力”的需要，为获得“扶老携幼、扶危济困”能力，世上所有政权都平衡生产与分配。美国貌似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倾向生产扩张，倾向“资本主义”，比较“右翼/保守”。其实，美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占GDP比例与欧洲持平甚至略高。欧洲福利属于“全民”福利，而美国只给最穷阶层“兜底”，为其提供免费的教育、医疗、甚至住房。因此，当代西方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并不认同少数外国人给本国政权贴“资产阶级专政”标签。

由于政治共同体“内聚力”的需要，世上所有政治共同体的政权都努力推广国家的“通用语言”和“主流政治文化”，强调“同”而非“异”，强调“合”而非“分”。这不是“文化歧视”，而是“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统一”性所致，为在全国范围内一体平等地推行“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从根本上讲，因为政治共同体间激烈的生存竞争，“主流”与少数“非主流”间的差异必会被竞争对手充分利用，以削弱对手的“守望相助”。所以，“少数民族”或“少数族裔”问题恒定属于“国家安全”问题，国家政治安全问题。超大型政治共同体内部必然存在少数族裔与主体族裔的政治文化差异。外国移民构成的美国更非例外。现实都会被承认。但承认现实是为了改变现实。“存异”是为了“求同”而非固化差异，求同是为了政治共同体在激烈竞争中生存，不给竞争对手攻破堡垒的机会。美国不允许不通英文的外国人入籍美国；移民学习英语是公费，但学习移民母国的母语则需自费。

精神信仰差异不是政治共同体的原因，而是政治共同体的结果。精神信仰很早就有，原始部落精神信仰的标志是“生殖崇拜”和“动物图腾”。但有了城邦才有庙宇，才有系统的“宗教信仰”。没有西藏政治共同体，就没有“藏传佛教”的兴旺。基督教的兴旺是因为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出现“自由民主”与“社会民主”的差异，不是因为学者看法不同，而是因为美国与欧洲各国历史条件不同。西学强调出现“单一神”宗教的政治意义，其内在逻辑是价值观的真理性、绝对性。然而，从新史观看，“单一神”或“真理”并不神秘。

第一，宗教以来世的理想制衡现世的不平等，也在现世支持世俗的“扶老携幼、扶危济困”，从而有助于一些政治共同体的“内聚力”。耶稣基督帮助贫苦人甚至妓女，医治跛脚的、失明的、瘫痪的、患麻风病的，成为穷人的希望。在当今的伊斯兰政治中，如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伊斯兰教的吸引力也不脱“扶老携幼、扶危济困”。斋月及葬仪的平等，严禁偶像崇拜，也体现宗教鼓励“平等”的一面。

第二，“普世”的单一神信仰，不利于政治共同体独立自主的内聚力。伊斯兰教教义严格的统一性，是形成大型政治共同体的障碍。在伊斯兰世界里较有规模的政治共同体是推动“世俗化”的土耳其和埃及，还有“什叶派”的伊朗。构建稳定的政治共同体，欧洲需要统一的天主教体系分裂出地方性的“新教”，进而“世俗化”。所谓“世俗化”，其实是淡化宗教共同体，回归“生活共同体”的本意。当代美国信奉“自由民主”，而当代欧盟各国信奉“社会民主”。共产党中国与共产党苏联的意识形态并不相同。苏共强调马克思的学说是普世“真理”，党的机关报是《真理报》。中共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党的机关报是“道不远人”的《人民日报》。当代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的富强事业定义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

(3) “生产力”，指政治共同体内人均的财富生产效率。政治共同体间相对的“生产力”，是塑造竞争力的第三要素。

为什么是政治共同体的“人均”而非“总和”生产力？政治共同体的人口规模是第一要素；但“人均”生产力体现政治共同体的整体技术应用水准，从而展示财富生产效率的高低变化。“人均”扩大，“总和”随之扩大，两者在GDP数据意义上是一回事。但“人均”是因，“总和”是果；技术进步是因，财富生产效率是果。尽管中国人口庞大，生产的财富量也庞大；但若中国教育科研欠发达，在推广先进技术方面停滞，人均财富生产效率就停滞不前，竞争力也停滞不前。

“生产力”是政治共同体“竞争力”的**崭新要素**。自城邦以降的五千年政治共同体历史里，“生产力”不是显著因素，直到三百年前世界开始进入制造业时代。

发现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作用是近代西学的重大成果。因为出现制造业，在农牧时代领先的中国陷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有何等规模和内聚力，“迭代”的技术落后、生产力落后，甚至大型政治共同体也会陷入挨打挨骂的困境。

而今技术再次迭代，从“制造”时代进入无形产品的“创造”时代，“制造”正被数字化的“打印”取代。中国的创造力能否领先世界，是个举世关注的待解之谜。

到2021年为止，中国人均生产力远不如发达国家。用美元计算人均GDP，美国是7万，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平均4万，中国仅1万多。中国技术落后，财富创造力低下，还有很多农民以人力锄头耕田。这是美国对华发动“新冷战”的底气。生存竞争正严重考验着中国的人才环境，否则中国也会被开除“球籍”。

就中国政学两界的理解而言，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理解不同，“现代化”指的是政治共同体的“富强”。（军事）技术的先进导致“强”；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富”。邓小平建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他期待中国从1980到2080年的百年间，追上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均财富生产效率。百年里达到这个目标非常难，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与“生产效率”有张力。

(4) 政治共同体的“竞争力”取决于“规模、内聚力、生产力”三个相对要素的合力，但三要素之间存在巨大张力。

为什么全球的“超级大国”极少，只有个位数？因为三要素间是“张力”关系，彼此能抵消，很难形成有效“合力”。

第一，“规模”越大、平衡精英与平民的“内聚力”越难，人均“生产力”越难提升。

第二，“内聚力”越强，对各方精英的包容越弱，提升人均“生产力”越难，维持较大“规模”也越难。

第三，“生产力”越高，精英地位越高、平民地位越低，维持“内聚

力”和“规模”也越难。

所以，“超级大国”极鲜见，而今只有三、五个。

美国是西方规模最大的政治共同体，却为什么拥有全世界最高等级的人均财富生产力？从本文的理论视角分析，那是因为美国拥有领先全世界的军事技术，并且强硬行使全球军事霸权。

美国的“生产力”与“规模”及“内聚力”的张力其实也很明显。首先，美国倾向精英，贫富差距巨大，常被诟病为“资本主义”国家，“内聚力”有明显缺陷。其次，美国的国土“规模”和地缘意义上的“势力范围”超大，庞大落后的“编外人口”弥补了美国国民“规模”只有3.3亿的缺陷，为平衡美国精英与平民提供了额外物质条件。美国的巨大生产力与美元充当国际通用货币相关；美元霸权基于美国的军事技术领先全球，导致军事霸权，导致“势力范围”涵盖全部南北美洲并远及欧亚大陆和日本、澳洲。由于超高的“生产力”，美国极难维持其“内聚力”和“规模”。美国与其“后院”矛盾重重，是美国世界霸权的软肋。反之，缺少“规模”意义上的对外“过度扩张”，美元就只是美国的法定货币，美国也难以维系其超高的“生产力”。

在政治共同体的“规模”及“势力范围”相对稳定时，竞争力的主要原因变量是“内聚力”和“生产力”。

在相对漫长的和平时期，强调“内聚力”而牺牲“生产力”很可能得不偿失。世界已迈入“创造”无形产品的时代，即“知识经济”时代；技术革新速度飞快，进步常带有“迭代”特征。牺牲“生产力”也意味着削弱未来战争的能力。

战争胜负直接导致国界更动和国家规模变更。一旦战争压力急剧

升高，政治共同体会转而强调“内聚力”而牺牲“生产力”，平民和政治家们就很难宽容“精英的傲慢”。战前、战争中、战后初期，社会平等措施明显增加，社会平等度升高；然后在相对长久的和平时期社会平等逐渐下降，社会贫富差距加速扩大。法国学者皮凯蒂暴得大名，因为他以海量数据证明这个关于“资本”或“市场”逻辑的常识。

“竞争力”指的是三要素的“合力”；“合力”受三要素间的张力制约。这是个动态机制。三要素“合力”的动态变化塑造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竞争力，解释不断变化的竞争结果。

至此，笔者完成了“新国家理论”的陈述，也为本文开篇提到的两句至理名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和“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做了关于“所以然”的注解。

以往中外的“国家理论”都是关于“政权”的理论，依赖拆分“政权”和拆分“社会”，并非真正的“国家”理论。那些理论不断拆分和重新组合“政权”与“社会”的关系，甚至强化关于不同政体的偏见，数十年来并没有生产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知识。“以政治共同体为基本分析单元”的“国家理论”，突破“政权与社会两分”的知识框架，并把“国际”与“国内”两分的知识在逻辑上合为一体。

社科理论也是“格物致知”。但此“物”非彼“物”，社科“格”的是人类的群体组织。人类社会变动不居，过去、现在、未来不同，所以社科理论都是有待证明的“假设”。其实，社科理论的解释力只能被“说明”，不可能像物理学理论那样被“证明”。“以政治共同体为基本分析单元”的理论只是若干“假设”之一。这种“假设”的理论企图解释上下

五千年人类社会的变迁，故也称“史观”，属于“历史哲学”类。在“假设”尚缺乏广泛吸引力时，一切“证明”的努力都是徒劳。当公众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历史逻辑”对生活的影响，理论在读者中的吸引力自然增加，甚至“不证自明”。那并非理论构建者的“先见之明”，而是历史本身的力量。笔者已在以上四节的理论建构过程中努力展示“解释力”，故不再单独写作“证明”部分。

然而，笔者仍有“说明”的冲动，增写一节概述新史观的学理位置和应用价值，权充“结论”；尽管那并非理论建构的必要组成部分。

五、新史观的学理位置和应用价值

作者清楚地意识到：“以政治共同体为基本分析单元”的理论会被贴标签、贴“民族主义”甚至“中国民族主义”标签。对类似广告传播业者那样喜欢“贴标签”、不愿费力讲道理的“学术”评论，作者不会费力予以回应。

分五个问题领域，本节概括“新史观”的学理位置和应用价值。

1、政治共同体与“人类文明”

站在更高层次上，说明政治共同体在“文明”中的地位，能更有效地展示“以政治共同体为分析单元”的新史观。

学界通常理解的“文明”（civilization）分为三类：**实用技术文明**、**抽象知识文明**、**社会组织文明**。如此，考古学把人类“文明”的初阶门槛定为三项：**金属**、**文字**、**城市**。金属冶炼终结石器时代；文字系统开启积累抽象知识之门；城池建造区分定居与非定居的不同社会组织形式。

《周易》指“文化”（culture）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属于“社会组织”文明的一部分，是建构“社会组织”的支柱之一。可“观”的“人文”作品分四大类：历史记述、宗教经典、文学艺术、制度典章。各种人文作品与各类人群互动，“以文化人”，不断形塑“社会规范”，构筑有限地缘内、有历史局限性的“天下”秩序。

社会科学理论本属“抽象知识”类。但社科理论强调“实用技术”功能。更尴尬的是：“社科”理论的解释对象是“人”，与“人文”作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任何理论创造者能彻底摆脱价值判断。

在“政治共同体理论”里，不仅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生存竞争及竞争胜负驱动“社会组织”进步，而且是推动“实用技术”和“抽象知识”进步的主要动力。

自五千年前城邦出现以来，“社会组织文明”的进步围绕政治共同体的生存竞争进行，体现为小型政治共同体向大型政治共同体的凝聚。看上去，政治共同体总在兴亡中徘徊，在地缘的“分与合”及“进与退”之间徘徊。但从五千年大历史看，贯穿古代和中古历史，聚合

的总趋势非常清晰：众多部落聚合为城邦、众多城邦聚合为领地、众多封建领地聚合为国家、众多中小国聚合为大国甚至超大国家。五千年后的今天，全球只剩下两百来个政治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的聚合，而非阶级斗争，指向“世界大同”。

在政治共同体的分合、进退之间，我们能看到国家竞争力强弱取决于相对的规模、内聚力、生产力，取决于三要素间的合力与张力。竞争带来的相互交流和彼此促进，解释实用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社会变迁和观念的演化、以及政治设施和法律体系的进化，即一切“实用技术”和“抽象知识”乃至“社会组织”的进步。在缺少政治共同体的生存竞争之处，“文明”停滞不前。

2、政治共同体与“市场规律”

以“市场规律”为名，“供给”与“需求”两分及同义的“投资”与“消费”两分，长期主导近代以来的经济基础知识。经济学人在公众面前似乎永远在争议两者的轻重。

上述“两分”其实是“一体两面”。本质上，投资来自为消费准备的储蓄；而供给的是市场需求、需求的是市场供给。争议“鸡生蛋，蛋生鸡”，逻辑陷入死循环，争议就“永恒”了。

上述争议貌似经济思想分歧，其实是政治分歧，在于是否信任政府，或某类政府是否值得信任。政府投资当然“挤占”民间消费。但横向看世界各国，相较于民间投资的政府投资，效益高低均非必然。即便政府主要投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本，也有大量“投资效益递减”的实证，支持由民间资本占领这些经济“高地”。

政治分歧导致持续了三百年的争议，争议何为“恰当”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争议至今没结果，也永远不会有结果。双方都能提供扎实的国别证据和数据分析。不同的政治立场“两分”出资本至上的主义（capitalism）和政府或社会至上的主义（statism或socialism）。前者强调“效率”，后者强调“平等”。

然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生存在同一个政治共同体里。自从货币与金银脱钩，纸币成为“主权货币”，经济三要素就都处在“政府”权力笼罩下。“民主”政府当然干预劳力市场、土地市场、货币市场；而且干预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政府税收占GDP总量的比例逐渐增大，“政府投资”的比例也越来越大。由于政治共同体间的竞争激化，趋向“平等”的世界大势非常明显。

三百年的争议指向“三”，在“政府与市场”两分之外的“三”。“国民”

既非市场也非政府，是“三”。但“国民”的需要显然因时、因地、因人不同。无数“自由主义”者讥讽“人民”这个整体概念。

政治共同体理论给出了“三”的新解：国民的需要有统一性，统一性来自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生存竞争，来自国家间相对的“规模、内聚力、生产力”。自古以来，一切“市场规律”都被更高层的“政治共同体生存竞争”左右或扭曲。出于早期政治共同体的生存需要，中华在两千七百年前就设立政府粮仓“常平仓”，丰年余、简年糴。

3、政治共同体与“政权类别” (regime type)

世界各地的人们，对本国政权“性质”的“先进性”大多信念十足。

问题是如何判断“先进性”？“新史观”给出新解。

政治共同体以“规模、内聚力、生产力”分，就不能以“社会分层”和“政体性质”分。在内容上，“国家治理”其实类同，都在自身历史和物质条件下做“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的事，以维持相对的“规模、内聚力、生产力”。当代政治学热衷给政治共同体的“政权”做“性质”分类，分为“现代”或“中古”或某个“阶级统治”的。给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政权做“文明/野蛮”、“先进/落后”的分类，体现旧知识体系导致的偏见。

全球各政治共同体的“治国方式”的确在“进化”或“现代化”，甚至“趋同”。但趋同是政治共同体生存竞争的结果，是竞争胜负“社会化”的结果。至于政治是否比以往更“文明” (civic)，属于价值判断。确定的事实是：竞争越来越激烈，武器向更短时间里杀死更多人的方向“进化”，各种“道义”包装越来越显露出虚伪。

无论在哪国，历史和现实中都普遍存在“个人主义、家庭主义、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己政治共同体的利益至上）”，只是因时因事而有侧重。在政治共同体的生存竞争中，侧重宣扬其中一项，旨在贬抑对手和团结内部，与“更文明、更人道、更进步”无关。美欧日澳宣扬自己的政体比其他政体更注重“个人”的自由；但事实上，美、欧、日、澳比中国“集体主义”得多，只是集体管的事类别不同。

我们能消除“政体偏见”？只要还有政治共同体的生存竞争，这种偏见难以消除。赞扬本国或贬抑别国，是政治共同体生存竞争的显著手段，是强化内聚力的手段，目的是战胜他国。古希腊的雅典城邦贬抑斯巴达城邦，两者还共同贬抑波斯王国，结果却是三者一同毁灭。而今，竞争到了关键阶段，堪比从“春秋”进入“战国”的时代。

竞争显然不是为“先进”政体消灭“落后”政体，更不是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而是全球大型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生存竞争，让自身更强、势力范围更大，以保障“国家安全”。

既然无力消除偏见，为什么还要指出偏见？指出偏见属于“抽象知识”，有助于揭露虚伪。以政体“先进”或“落后”的名义屠杀“野蛮”或“落后”的本国和外国人，不仅是旧殖民帝国时代的旧口实，也是新帝国时代的新口实。

1876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欧洲组织了“国际非洲协会”。8年后的1884年，在欧洲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上，他以口若悬河的“文明”叙事折服了与会代表，列强同意分给他一块“私人领地”，即面积广达230余万平方公里的刚果（金）。到1908年比利时政府接管这块“私人领地”为止，他疯狂敛财，以砍掉劳工妻儿的手来控制劳工，使那里人口减少一半。美国以“文明”的名义倒行逆施，把黑人变成白人农场主的奴隶；还在国土上实行种族灭绝，立国仅百年就几乎杀尽了国土上的印第安人。伊拉克的政体无论多么“落后”，也不是美国通过制裁和战争杀戮其成百万国民的“理由”。

指出政体歧视是偏见，关于中国革命史的认识也进步了，“阶级斗争史观”进化为“政治共同体史观”，进化为“统一战线”史观。如此，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就能解释中国共产党三代人的接续奋斗，解释新中国取消又恢复市场机制，解释先后推出一胎化和多胎化政策。国家不以“主义”分；“落后就要挨打”。苏联与美国“政权性质”貌似根本不同，但都曾威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4、政治共同体与“语言/宗教文化共同体”

没人企图否定语言和宗教文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问题是：“语言和宗教文化共同体”是“政治共同体”的原因还是结果？

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不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逻辑死循环。**政治共同体是语言/宗教文化共同体的原因；语言/宗教文化共同体是政治共同体的结果。**政治共同体理论指向“中华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

(1) 政治共同体促成语言的形成和演化。

群体使用的语言，更替速度可以非常快。若政治共同体足够坚强，一代人就能完成地方语言更替和与主流语言的交融。

移民美国的中国人，第二代就丧失使用中文的能力。中国现有的

多种“少数民族”语言，是早年原有政治共同体的结果，也体现而今尚未完全融入中华政治共同体。

自西学东渐，特别自改革开放以来，中文严重受西文影响，英语语法规则已经成为中文语法规则，而且大量西文词汇渗入中文。英语强大是英美相继强大的结果。港式中文，台式中文，新加坡式中文，都与政治共同体的独立性相关。由于政治共同体的独立性，不仅朝鲜语与韩语的差异在增加，日语和韩语里使用的汉字也在减少，汉字含义更同中文原义渐行渐远。

政治共同体内部的“通用语言”是政治共同体规模和势力范围的结果。因反复的外来入侵，英伦岛上语言混杂，各种古语精致的语法规则，如格、数、性，被逐渐简化，简化成“上等人”耻于使用的“粗鄙”语言。英语在全世界普及不是因为盎撒（盎格鲁-撒克逊）人“惟德动天”，而是英国和美国追求“规模”的结果。在16世纪的最后几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决定加入争夺美洲的殖民运动，为“英语文化”开拓了辽阔的进化空间。在欧洲殖民浪潮中，莎士比亚（1564-1616）用“粗鄙”的英语写成精美诗歌和戏剧作品；英国移民在海上唱着他的诗句去开拓北美洲。英语被英国和美国带到了全球，而今成为世界的“普通话”，让欧洲人创造平等“世界语”的努力成为呓语。通用英语的印度人与英美人谈不上血缘关系；非洲人与法国人或英国人也没什么血缘关系，却通用法语或英语。新加坡的居民主体是华人，立国前普遍认同中国，讲华语、写象形汉字。但立国后，新加坡以国家独立生存为第一要务，仅一代人就普及了英语。

独立的政治共同体或分裂政治共同体的企图，都会要求“民族语言独立”。美国独立后立即区分“美语”和“英语”，而且出版字典，确定原本因移民文化程度低而拼错的词汇为“美语”。在苏联解体前，乌克兰从未有过独立国家历史，乌语与俄语也分得不清不楚，大体是北京话与天津话的方言差异。一旦乌克兰成为独立国家，为加入欧盟并获得北约保护，乌与俄努力划分界限，重写历史，强调乌克兰语，努力让俄语出局。哈萨克斯坦的老总统曾是苏共要员，甚至有望接替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一旦建立了独立的哈萨克国家，为本国生存，他就努力让俄语出局，直到自己“被出局”。语言是政治的结果而非原因，政治共同体才是追求语言独立的原因。政治共同体必然要求“少数民族”能使用本国主流的“通用”语言。

(2) 政治共同体促成宗教/文化的交流、交融、演化。

宗教/文化的进步，乃至各地典章制度的演化，是政治共同体竞争规模的结果，是交流乃至交融的结果。反之，宗教/文化的独立性，是政治共同体分裂独立的结果。

“有史以来”，政治共同体一直在趋大。“趋大”是在政治共同体规模竞争中发生的，是在政治共同体漫长的进退分合、兴衰继绝中发生的，是在维系政治共同体纽带的松紧变化中发生的。从“蒙古”到“内蒙古”，从“吐蕃”到“西藏”，从“西域”到“新疆”，历史脉络非常清晰。

文化在政治共同体的安全竞争中交流、交融、演化。天主教是西罗马帝国的文化，东正教是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文化。移民主导的“美国文化”，包括非洲文化在内，是多种文化的融合，于是美国文化得到全世界的共鸣。美国拥有世界霸权，所以文化开放，制作出比阿拉伯人理解得更鲜活的《阿拉丁》电影，以及比中国人理解得更鲜活的《花木兰》电影。

西方学者经常视宗教为区分“文明”的标志。但“文明”分为“实用技术、抽象知识、社会组织”三大类。宗教从属“文化”；“文化”从属“社会组织”文明。

“宗教”是组织社会的有效手段之一；近代以来形形色色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是。近代政治意识形态以“科学”自称，不再“天然”。但两者并非天造地设，都是人造的，为的是组织本土的政治共同体。宗教文化与“古代”和“中古”政治共同体的“内聚力”组织有关。

特别偏重地方人文知识的国家，是落后国家。自从制造业兴起，文化进步的源头主要是政治共同体间的科学知识和实用技术竞争。科学技术也是未来世界文化统一性的基础。这个趋势反映在各国中小学教学时间配比里。专业基础知识也是政府各部门录取公务员的条件。对现代大型政治共同体而言，科学技术进步是推动历史最显著的动力；而宗教/传统文化，属于落后的“内聚力”方式。中华自古以来排斥“政教合一”，强调群体“过日子”乃至“过好日子”的世俗常识。这是中华庞大的政治共同体能延续三千年至今的重要原因。在马来人汪洋大海里的微型城邦新加坡，华人占七成，信伊斯兰教的马来裔和信印度教的印度裔占人口三成。新加坡政治共同体“内聚力”的主要手段是：淡化宗教文化差异，强化现代科技知识教育，不断强调：连淡水资源都没有的新加坡，国民富裕到人均GDP已臻世界最高峰。

政治共同体的兴衰导致宗教文化的兴衰。对比中华境外的宗教文化史，其演化的历史脉络能说明这个结论。

从世纪初算起，罗马帝国生存了400多年，略久于汉朝。犹太人耶稣基督自称“神子”，于公元初年发动犹太教革命，建立基督教。这件“小事”因罗马帝国才变成“大事”。创教300余年后，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306-337年在位）颁布“米兰敕令”，宣告基督教在帝国境内合法。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召集了有1800多名基督教地方主教参加的“尼西亚会议”，即“大公会议”，统一对基督教的理解，认定“圣子耶稣与圣父和圣灵三位一体”。330年他迁都于东方的君士坦丁堡，即“新罗马”。337年临终前还举办受洗仪式，死后葬于君士坦丁堡。此后，罗马帝国历经近60年战乱，395年狄奥多西一世（379-395在位）临终时把帝国分给两个儿子，帝国正式分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基督教也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方正教”。又80年后，476年，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各部摧毁，欧洲史进入“封建”中世纪，但因为政教分庭抗礼，天主教会依然活着。一千多年后，与发现美洲的“大航海”大体同期，天主教会发生“宗教改革”（1517-1648）。“改革”延续百年以上，分出了不隶属教会的“新教”，并以“宗教战争”（三十年战争）告终。作为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新教”各自为政，流派众多，基督教的“流派”成为欧洲新型政治共同体“nation”各自的文化支撑。“宗教战争”结束，“世俗化”进程开启，科学技术成就的竞争成为政治共同体竞争的核心。“宗教改革”后，天主教会推动扁平化，向南美洲乃至全球贫困落后地区推广，逐渐演化成扶老携幼和扶危济困的“专业社会组织”。

东罗马的拜占庭帝国实行以政领教，寿命长达千年，是世界史上最长寿的政治共同体。拜占庭帝国在620年废拉丁语，以希腊语为“国语”，在文化上推行希腊化/东方化。帝国在1204年被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破，近60年后又复国，到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灭国。拜占庭帝国迄今已亡国近600年。“东方正教”是东斯拉夫人宗教信仰的源头，影响力延续至今，成为基督教三大流派之一，倚仗的是俄国，一个从小小“莫斯科公国”扩张而成的“三洋大国”。从俄国到苏联到俄罗斯，政权牢牢控制宗教势力，主流文化是信奉科学技术。

阿拉伯帝国生存了600年有余。至800年前国灭，寿命长于罗马帝国和任何中国朝代。穆罕默德（570-632）于公元622年在阿拉伯半岛上建立伊斯兰教，比唐朝立国（618年）仅晚4年。至穆圣在

632年去世前，他已建成能推广其教义的阿拉伯王国，距其立教仅10年，史称“先知时代”。又30年，即“四大哈里发”时期，阿拉伯帝国成为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巨大政治共同体。接下来有90年的“乌玛亚王朝”（660-750，中国文献称为“白衣大食”）和500年的“阿拔斯王朝”（750-1258，“黑衣大食”）。这个“封建”王朝在1258年被蒙古军摧毁。然而，在9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建立后仅百年，各“封建领地”就已经四分五裂；位于中亚、波斯、北非的“苏丹国”只在名义上属于巴格达的“哈里发”。到9世纪末，“哈里发”成为波斯人和突厥人的傀儡；到10-12世纪，北非和西班牙的阿拉伯政权甚至在名义上也不再听命于巴格达。因灭掉波斯王国，穆斯林有了“什叶派”，从此阿拉伯人的政治共同体与波斯人的政治共同体纠缠不休。阿拉伯帝国由东向西进击东罗马帝国，又拥有北非和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地缘上像一只鹰的两只翅膀围住了欧洲，成为十字军东征的对象。由此穆斯林与基督徒纠缠不休，促进了欧洲的文化和科学昌盛。中国唐朝曾与阿拉伯帝国短暂争夺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失利，由此阿拉伯帝国成为中西交流的长期使者。帝国与西迁的突厥政治共同体搅在一起，伊斯兰化了突厥人，也成就了后来大放光明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阿拉伯帝国被蒙古所灭，却是阻挡蒙古西侵并伊斯兰化蒙古人的势力。由于灭国距今近800年，这个庞大松散的阿拉伯政治共同体常被忘记。以阿拉伯帝国最盛时的版图为理想，前些年曾在中东地区短暂存在过“伊斯兰哈里发国”。这个政治共同体自以为复古成功，其实不过是现代大型政治共同体的战争工具。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维持了600年，与阿拉伯帝国大体同寿。到1924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国灭迄今才百年。奥斯曼帝国的600年历史与欧洲“近代史”同时发生，与欧洲各政治共同体纠缠在一起。因为历史晚近，著述汗牛充栋，证明这600年帝国史是政治共同体的历史，宗教史只是附庸。自1453年攻破君士坦丁堡进入欧洲，奥斯曼帝国就陷入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冲突和交流交融。与欧洲各政治共同体纠缠，导致了帝国的一个显著特征：语言文化上的“神经错乱”。当代土耳其依然“找不到北”，关于敌友的外交立场变化几乎可用“小时”计。还是证明，文化是政治的结果而非原因。

上述历史叙事，旨在说明：“宗教/文化的演化，乃至各地典章制度的演化，是政治共同体竞争规模的结果，是文化交流乃至交融的结果。反之，宗教/文化的独立性，是政治共同体独立和分裂的结

果。”

(3) “中华民族”与中华“少数民族”的关系

中华“主流”语言文化与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差异明显。但在不同区域，语言文化的差异程度大相径庭，西南明显小于西北。语言文化差异程度与中华政治共同体的规模和内聚力大小相关，与“少数民族”政治共同体融入中华政治共同体的时间长短相关。融入时间长短与地理障碍相关，与“少数民族”原有政治共同体的规模相关。新疆是“三山夹两盆”的辽阔低谷地带，原有人口稀少，生产力低下，从未催生独立文化；东邻强、跟随中原文化，西邻强、跟随伊斯兰文化，北邻强、跟随苏联文化。

自上述动态的历史变化中，我们可抽象出下述三点理解。

首先，政治共同体高于语言文化共同体。尽管中华民族和少数民族中文都称“民族”，两者不是一回事。“少数民族”是语言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是政治共同体。语言文化共同体源于历史上的政治共同体；现有的政治共同体高于语言文化共同体，否则意味着中华政治共同体的分裂。政治共同体高于语言文化共同体，不仅是知识，而且是两者关系的政治原则。政治共同体间的生存竞争事关“国家安全”，是坚持“政治共同体高于语言文化共同体”原则的根本原因。

其次，上述政治原则衍生出两条实践准则：必须推广“通用国语”，必须构筑主流“政治文化”认同。强调使用通用国语的能力，要求在公立学校里学校学习使用“普通话”（英译是“common language”，即“国民通用语”或“国语”），为的是强化政治共同体的内聚力，即推行国民平等，压制地域区隔和地域歧视，促进国民在国土内流动、获得平等的工作机会。普及“普通话”，并不代表排斥“越语”或“粤语”，但确实意味着公立中小学校不再承担“保护地方语言或少数民族语言”功能。同时，构筑“主流政治文化”，强调所有国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逐渐取消一切以“民族文化差异”去强化“国民政治身份差异”的典章制度，比如“身份证”上的“民族”栏。在大型政治共同体里，特别在地理障碍极明显的中国，这两条做起来非常艰难，要求掌握轻重缓急的高超政治艺术。然而，从原则上看，所有政治共同体都在“语言”和“政治文化”两方面非常强硬，并付出极高成本，甚至流血。对这两条的外部指责，大多出于削弱甚至摧毁这政治共同体安全的企图。发动指责者，其本国的历史大多也

是对指责者本身的反驳。包装成“善意”无法掩盖他们攻击的“恶意”，人们很快就会他们图穷匕见，把制裁甚至杀戮指为“人权”。

再次，“少数民族”的文化进步来自与政治共同体主流政治文化的交流和交融。受列宁主义通过“民族自决”来“解放被压迫民族”理论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古今中外最善待境内“少数民族”的政治共同体，政权竭力“拉拔”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和经济水准。然而，列宁理论支持“分”和“异”，专注于推翻欧洲传统殖民帝国，维护“民族建国”的政治权利。在一段时期里，中国政府以为“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差异”就是帮助“少数民族”。事实上，强调差异并没有导致消除歧视，反而方便强化彼此的地域文化歧视，并给外部竞争对手提供分裂中华的可乘之机。

相对“少数民族文化”，“中华主流文化”的精髓是“政治文化”，即维护“大一统”，维护政教分离，强调共同体成员携手互助“过日子、过上好日子”的世俗生活，天然倾向现代科学技术。

“中华民族”是包含众多语言文化的“政治共同体”。对中华境内一切作为语言文化共同体的“少数民族”而言，融入“中华民族”大一统，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进步，是文化进步的唯一途径。在这方面，中国不是例外，英、法、德、美、俄、日，莫不如此。

推广“通用语言”和“主流政治文化”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政权不歧视任何语言，但公立学校必须修习“国语”，即全国通用语言。全体国民的社会流动和工作机会平等，系于全体国民有能力使用全国通用的书面语。通用语言有助于法律在全国通行，制止政治歧视，实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对的平等是政治共同体“内聚力”的根基；不平等明显扩大，是政治共同体“分裂”的原因。

其二，“主流政治文化”，不是指生活习俗相同，而是指认同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体制。在中国，“主流政治文化”包含、且仅包含三种认同：（1）认同中式“政教分离”，即宗教机构接受行政机构管辖；（2）认同改土归流而成的“郡县制”，即地方官员由中央政府任命；（3）认同中国由政治上统一的执政集体领导，即“党的领导”。

中华本无“汉人”，只是因为通用汉朝以来的文字和文字发音而有所谓“汉人”。“国语”和“主流政治文化”是“中华政治共同体”或“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标示。

5、政治共同体的现在和未来

对政治共同体前景的认识，展示不同理论的解释力。眼下，不同

的史观/政治理论，描述出政治共同体的四种不同前途，都指向人类“大同”。

第一，核威慑失效，核大战爆发，超级大国用尽本国武库里的战略核武器，毁灭所有都市文明。这是回归石器时代的“大同”。

第二，多极平衡长期稳定，有限的人员、货物和资本流动缓慢促成世界通用语言和世界政治文化。“大同”近在咫尺，却遥遥无期。

第三，一国独大，出现“共主”的“封建大同”，少见人员、货物和资本流动限制，但霸主随时防备和残酷打压潜在的霸权挑战国。

第四，否认政治共同体有将来。“全球化”正在消蚀掉政治共同体的疆界，“自由民主”势力将击败“专制”势力，创造出人人“自由”的“自由大同”。或者，“全球化”正在消蚀掉政治共同体的疆界，“被压迫阶级”联合“被压迫民族”将击败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创造出人人“平等”的“共产大同”。

眼下，中国快速崛起却依然落后，远无称霸世界的实力。中国支持“和平与发展”，坚决否认本国“国强必霸”。中国反对霸权，反对战争，主张维护所有大小政治共同体的主权和平等，但也号召逐步消除“全球化”的一切障碍，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中国立场是“非意识形态”的，兼顾维护现状的保守性和支持“全球化”的进步性。然而，当美国防范中国的敌意增强，发动对华“新冷战”，中国只能与俄罗斯“背靠背”。美—中—欧—俄，已经形成与意识形态无关的、很不稳定的“四边形”格局。

人类五千年政治史，是政治共同体竞争生存发展的历史。当代政治史是超大型政治共同体主导的历史。由于当代世界由巨大的政治共同主导，生存竞争激化，军事和军事技术竞争不断强化，大型政治共同体间的“相处之道”已成世界政治焦点。根据“以政治共同体为分析单元的理论”，下述以“拖延”为核心的相处之道乃是必然结论。

第一，需要承认“安全利益”矛盾，通过经常的谈判来不断澄清彼此的“安全利益边界”以及边界更动。当然，安全利益边界和边界更动是以实力和实力变化为后盾的，实力变化并不容易被对方承认。

第二，需要拒绝以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来故意模糊“安全利益边界”，从而减少双方冲突的不确定性。对“普世价值”的不同理解非常危险，会加速驱动群体间进入战争，陷入人类自杀陷阱。

第三，需要经常不断地界定“先进（军事）技术”的边界，尽力保持一般商品的正常贸易和人员及资金往来。让地球上的生产分工持

续，甚至不断发展，是给和平一个重要希望。

第四，需要经常不断地确认核武器的“绝对性”或“不可使用性”，以避免立即共同毁灭的下场。“战术”核武器突破核武器不可使用原则的门槛，会导致战争迅速“升级”到使用“战略”核武器。

第五，需要不断确认和强调，政治共同体间的生存竞争不仅带来深重的痛苦甚至毁灭，也带来异质文明的交流和彼此取长补短的进步，乃至趋同。因此，在和平时期，强调对手的优点，尊重和赞扬对手，展示自信，是给自己进步的机会，更是给和平一个重要机会。尊重和赞扬对手，并不会削弱战时的“同仇敌忾”。始终贬损和抹黑对手，也未必能增加战时的“同仇敌忾”。

概言之，矛盾是绝对的，冲突难免。但是，“拖延”大型政治共同体间的最后摊牌，事关全人类生存。只要时间拖得够久，未来不定会发生什么“历史规律”之外的“意外”，让人类团结起来。

多数问题不是被“解决”的，而是“熬”过去的。笔者博士论文研究中国“三农”问题，那时看到人多地少的“绝对矛盾”——没有任何“三农政策”能阻止中国农民的“无限供给”。然而，“活久见”，遥远的欧美市场导致问题消亡。二十年后，美欧对廉价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导致今日中国农民短缺、耕地大面积撂荒。新问题是，把耕地集中在少数真正的耕作者手中，让“耕者有其田”。问题没了，人还活着，就是“熬”过来了。Surviving the problem than solving it.

人类知识建在沙滩上，从来不稳固。在不确定中不断寻找确定是人类大脑的本能，也是知识的本质。知识之所以被尊重，因为“解释力”、因为“有用”，不是因为某些“天才”发现了“终极真理”。

(2022年9月1日，第二稿)